

探索巴西 G20 的科学： 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和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星球

PSE - CEPR 政策论坛
June 5-7 2024

主题演讲由
**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 Gabriel Zucman**

CEPR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ÉCOLE D'ÉCONOMIE DE PARIS

CEPR 新闻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187 boulevard Saint - Germain 750
07, Paris, France

33 Great Sutton Street
London, EC1V 0DX, 英
国

Tel: + 44 (0) 20 7183 88
01 Email: [cepr @ cepr. o](mailto:cepr@cepr.org)
rg Web: [www. cepr. org](http://www.cepr.org)

版权所有 © CEPR 出版社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CEPR) 是一个几乎由1900名研究经济学家组成的网络，这些经济学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大学。该中心的目标是双重的：促进世界级的研究，并将与政策相关的成果传递给关键决策者。“研究卓越并具有政策相关性”是CEPR 的指导原则。CEPR成立于1983年的英国，并在英国注册为慈善机构。2019年11月，CEPR在法国启动了一个协会，以便为在法国扩张提供渠道。协会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与英国信托会董事会成员完全相同。

CEPR 独立于所有公共和私人利益集团。它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不采取任何机构立场，其核心资金来源包括其机构成员、运行的项目以及出版物的销售。由于依托如此庞大的研究人员网络，其研究成果反映了广泛个人观点以及来自社会层面的不同视角。CEPR 的研究可能包含对政策的看法，但协会的信托人/管理委员会成员不会提前审查其出版物。本报告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CEPR。

董事会主席创始人兼名誉主席总
裁副总裁

Bean 查理 菲利普·里查
德·波特斯 贝雅特丽丝·
韦德·迪马奥 布蒂奇莉·
博蒂西尼 安东尼奥·法塔
斯 乌戈·潘齐亚 希莱恩·
雷 特莎·奥格登

首席执行官

巴黎经济学院

巴黎经济学院 (PSE) 是全球领先的经济学研究教育中心。该学院成立于2006年，汇聚了135名研究人员和约150名博士生。PSE提供高质量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以及暑期学校课程。PSE的主要使命是促进世界级的经济研究，并推动学术研究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对话。该机构致力于发展最高国际水平的经济研究，特别强调公共政策评估。作为独立机构，PSE保持高标准的学术诚信和思想自由。其研究成果反映了广泛的个人观点和视角，为法国、欧洲乃至全球的知情政策辩论和决策过程做出了贡献。

总裁

Esther Duflo

Director

Jean - Olivier Hairault

Introduction

第二期PSE-CEPR政策论坛于2024年6月5日至7日在巴黎经济学院校园举行。这一独特的活动专注于与顶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讨论新兴问题，并面向广泛的受众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立法者、媒体和学术界人士。该论坛由巴黎经济学院（PSE）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联合举办，包括主旨演讲、高层次的政策对话以及展示近期学术论文的环节。此外，还通过海报展示和高级博士生的报告展示了下一代经济学家。

2024政策论坛的三天分别聚焦于“国际税收”（第一天）、“气候变迁补偿”（第二天）和“全球贫困”（第三天）。该文件包含了这三天由Gabriel Zucman、Esther Duflo和Abhijit Banerjee所做的三场主旨演讲。完整的议程，包括论文和主旨演讲及政策对话的视频，可在以下链接中获取：

<https://cepr.org/events/event-series/pc-cepr-policy-forum/pc-cepr-policy-forum-2024>

Contents

超级富豪最低税收协调蓝图，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解决气候不平等.....	Esther Duflo..... 15
再分配案，	Abhijit Banerjee。 26

1 超级富豪协调最低税收的蓝图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巴黎经济学院和 CEPR

加布里埃尔·朱克曼讨论了对超级富豪征收协调最低税以解决财富不平等并为公共产品筹集资金的必要性。朱克曼提议对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征收2%的最低税，并强调基于财富而非收入设定最低税的重要性差异。他还讨论了wealthiest人士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和规避税收的问题，这导致政府收入大量流失，并加剧了财富集中现象。他强调了在解决税收不平等问题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了实施有效全球税收措施所面临的挑战。

讨论这个项目非常愉快，该项目旨在对超级富豪征收协调最低税，探讨其必要性以及具体实施方法。起点在于认识到进步型税收体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对于构建社会凝聚力和政府信任至关重要。进步型税收体系对于筹集教育、健康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资金必不可少，这些公共产品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此外，进步型税收体系也是公平分配全球化收益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回顾不平等的历史和税收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步性的变化在收入和财富集中动态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当税收系统更为进步时，即使是在征税前，收入集中程度也会降低；反之亦然。

直到最近，由于政府统计数据严重缺乏，很难知道超级富有人士缴纳了多少税款。没有良好的公开数据来反映超级富有人士的财富状况。这一缺口实际上被诸如《福布斯》等杂志填补了。¹ 福布斯 and 彭博社 但是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超级富豪实际缴纳了多少税款，尽管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是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最近，由于包括Arjan Lejour及其合作者为荷兰所做的开创性研究（Bruil等，2022；Leenders等，2023）在内的研究工作，这种保密的面纱开始被揭开。¹ 以及 Antone Bozio 及其合著者在法国进行的研究(Bach 等人，2023)²。目前，在其他国家也有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中，这产生了重大影响。去年我去荷兰时，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财政部长，每个人都认识到了阿贾恩·莱尤尔和沃特·伦德的研究。他们不仅了解这项研究，还接受了其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在荷兰的公众辩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自安托万·波齐奥及其合著者发布初步结果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事实上，法国的亿万富豪几乎不缴纳所得税。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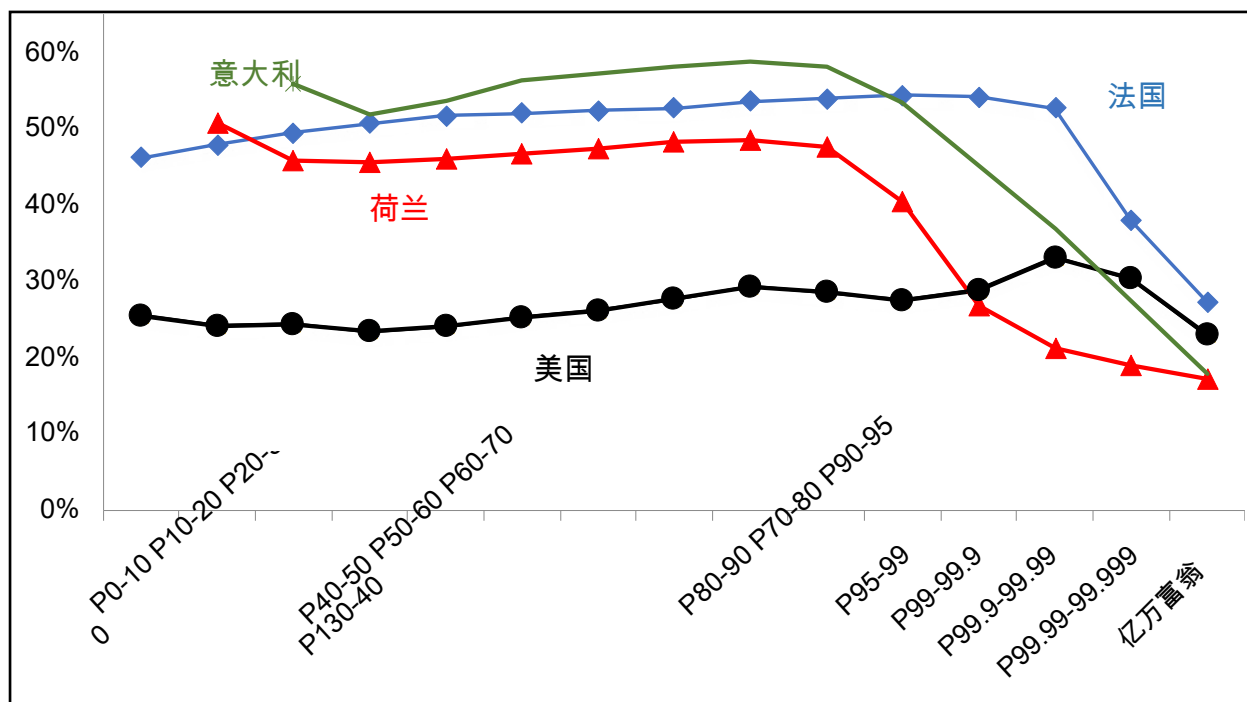
在 2024 年全球逃税报告中³ 我们，欧盟税务观察站，在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汇编了这些不同的研究，并尽力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各国之间的可比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比性，所有税收都需要包括在内。有时，研究只考虑税种的一部分，通常是出于正当理由，但如果要比较各国的整体税制进步性程度，或这种进步性如何随时间变化，最坚实的基础是将所有税种都包括进来。这意味着采用国际上公认的税收定义，遵循

1 Lejour, A., Bruil, A., van Essen, C., Leenders, W., Mohlmann, J. 和 Rabate, S.(2022)。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2 Bach, Laurent, Antoine Bozio, Arthur Guillouzoic, Clément Malgouyres (2023). "Do billionaires pay taxes?" Mimeo PSE - ESSEC - CREST. 3 https://www.taxobservatory.eu/www-site/uploads/2023/10/global_tax_evasion_report_24.pdf

经合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发布的各国综合税收收入统计数据。随后，这些总和数据按人群分组进行分配，其中人口按照相同的收入概念进行排名。

我们使用“分配国民账户”文献中描述的税前利润定义，即所有贡献于国民收入的收入都被包括在内，匹配国民收入的100%。个人按该收入指标进行排名。因此，P 0-10 是最低的10%成人在税前收入方面的底部群体，P 10-20 是下一个十分位数，依此类推，直到达到美元亿万富翁。当这样做时，以下图景显现出来（见图1）。

图 1 按收入群体和亿万富翁划分的平均税率(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



首先，在意大利、法国、荷兰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美国，所有社会经济群体都缴纳了大量税款。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法国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略超过50%。法国是一个高税收国家，政府每年从国民收入中征收超过50%的税款。因此，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缴纳了45%、50%，有时甚至超过50%的收入作为税款。唯一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在这些四个经济体中，超级富豪的有效税率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低的。这包括所有类型的税款，特别是包括全部的企业所得税，这些税款完全归对应公司的所有者所有。

有时人们会质疑谁应该承担企业税。可以argue出一种观点，即部分地将其视为对工人的税收。这会使情况更加糟糕：最终会导致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而亿万富翁的税率则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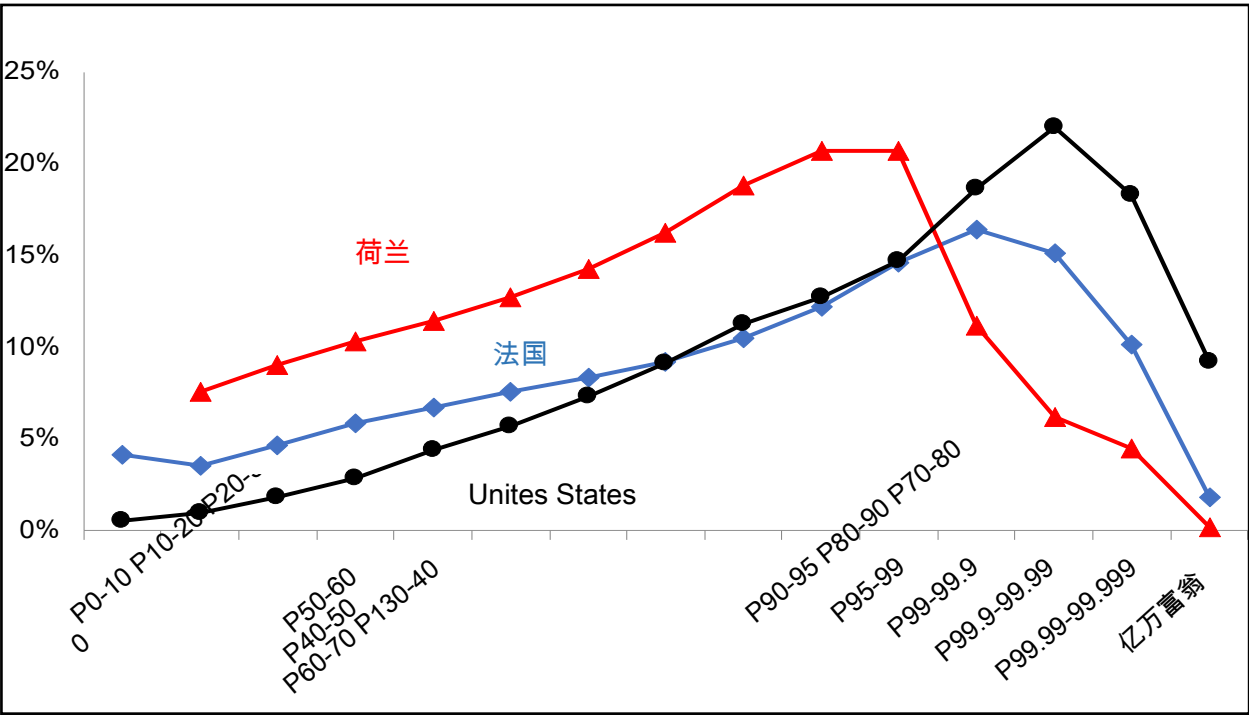
更多的研究是必要的，以确定这些模式在其他国家是否也成立，但这是我们根据现有研究能够得出的结论。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工作，将在北欧国家有所涉及，并非常希望在全球南方开展相关工作。我们已经开始与拉丁美洲的税务机关合作，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持续学习。

已经十分明确的是，有一种情况难以被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接受，即最富有的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行为者往往支付最低的税率。这主要是因为渐进所得税制度未能发挥作用，这种制度本应成为税收累进性的支柱（特别是应该抵消增值税等间接税的累退性）。

为什么？根本问题在于，当你非常富有时，收入的概念本身就不太明确。你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结构化你的财富，使其产生的应税收入很少，甚至为零。几年前在美国，美国媒体ProPublica揭露了亿万富豪如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等人支付的所得税情况，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多年来几乎不缴纳或几乎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持有特斯拉和亚马逊等公司的大量股份。这些公司不发放股息，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实现任何资本利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就会非常小，甚至为零。这是避免所得税的第一种常见技巧：指示你拥有的公司不要发放股息并避免实现资本利得。

The second technique, 从法国和荷兰的研究中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是在这些国家的亿万富豪中普遍存在通过个人财富控股公司规避个人所得税的系统性做法。如果你非常富有，而不是直接拥有资产和股票，你可以创建一个个人控股公司（即壳公司），该公司的持股代表你在企业的股份，并接收股息。由于这笔收入支付给壳公司而非个人，因此不受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因此，在实践中，法国或荷兰的亿万富豪实际上几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如图2所示。

图 2 按收入群体和亿万富翁划分的平均所得税税率(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



这张图仅关注个人所得税（以及存在财富税的国家中的财富税），并计算了按收入群体划分的平均收入和财富税率，以及亿万富翁的平均税率。对于大多数人口而言，个人所得税通常是累进的，但在顶层却变得累退，方式不同。例如，在荷兰，累退性在收入分布的第95百分位数附近相对较低开始；在法国，则在收入分布的更高位置开始；在美国则更高。在荷兰和法国，对亿万富翁的个人所得税率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低于2%。在美国，有效个人所得税率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不同之处：在美国，个人所得税率显著下降，但并未降至零。美国亿万富翁支付的个人所得税占其收入的比例约为7%、8%或9%，这是因为美国不允许像欧洲亿万富翁通过控股公司进行的税务避险。在美国，由于近一个世纪前通过的两项法律，无法通过创建个人财富控股公司来避免个人所得税。一项是在1921年关于超额留存收益的积累：自1921年起，被认定为用于税务避险目的的留存收益将被征加成本。另一项是在1937年，关于防止利用超额留存收益进行税务避险的法规。

美国的个人持有公司法 (Personal Holding Company Law) , 实际上禁止个人利用持有公司进行避税。

为了给出一个真实的例子, 以法国的主要拥有者路威酩轩集团 (LVMH) 的伯纳德·阿诺特为例。2023年, 他和他的家庭从LVMH获得了30亿欧元的股息收入, 所有这些股息都支付给了持股公司, 因此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相比之下, 比尔·盖茨作为微软的大股东也获得了大量股息, 但比尔·盖茨无法避免对这些股息的个人所得税, 因此他需要缴纳23.8%的联邦所得税来抵扣微软的股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亿万富豪在所得税方面比荷兰或法国支付得略多的原因。然而, 在所有情况下, 他们所支付的所得税都非常少, 且在最高层时, 所得税变得急剧累退。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首先, 显然这对于税收收入来说至关重要。政府会面临显著的收入损失。但更为根本的是, 这种避税行为会产生雪崩效应, 加剧财富集中。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就是考虑财富积累的过程, 如下方程式所总结的:

$$\dot{w} = (1 - \tau) r w$$

如果考虑个人财富 (w) 随时间的变化, 其财富会因为财富的随机回报 (r) 而增加, 这种回报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财富回报, 比如股息或资本收益。将这种回报视为扣除公司税后的净回报: 假设我持有路易威登集团 (LVMH) 的股票, 在某一年里, 其股价上涨了10%, 即: $w_{t+1} = (1 + r) w_t$ 。考虑到路易威登集团已经缴纳了公司税, 因此财富回报率为1.1。现在, 这种随机的财富回报率将根据一定的税率 (τ) 进行调整。

因此, 我在该年度作为LVMH股东应缴纳的所得税占我财富的比例。因此, 如果回报率为10%, 但税率仅为2%, 我的税后回报率为8%。这样, 我的财富会机械地增长8%。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术语 (τ), 这代表我在支付所有其他税费 (如社会保障贡献、消费税等) 后的劳动收入所能节省的部分。对于亿万富豪而言, 这个节省部分相当于他们财富的一部分。而对于财富较低的人群, 则是相对较小的比例。

重要的是第一项, ($1 - \tau$) 项在数量上更重要。

分布, w 服从
 τ

所以, 把回报想象成随机的, 想象成作为确定性或随机性的存在, 这些类型的随机方程有一般类别的结果, 这类方程被称为“Kesten方程”: 在某些正则条件下, 这些过程会收敛到一个稳态分布。此外, 稳态财富分布具有帕累托上尾。最后, 决定稳态中财富集中程度的帕累托系数将取决于平均净税回报率。因此, 这是这类过程的一般类别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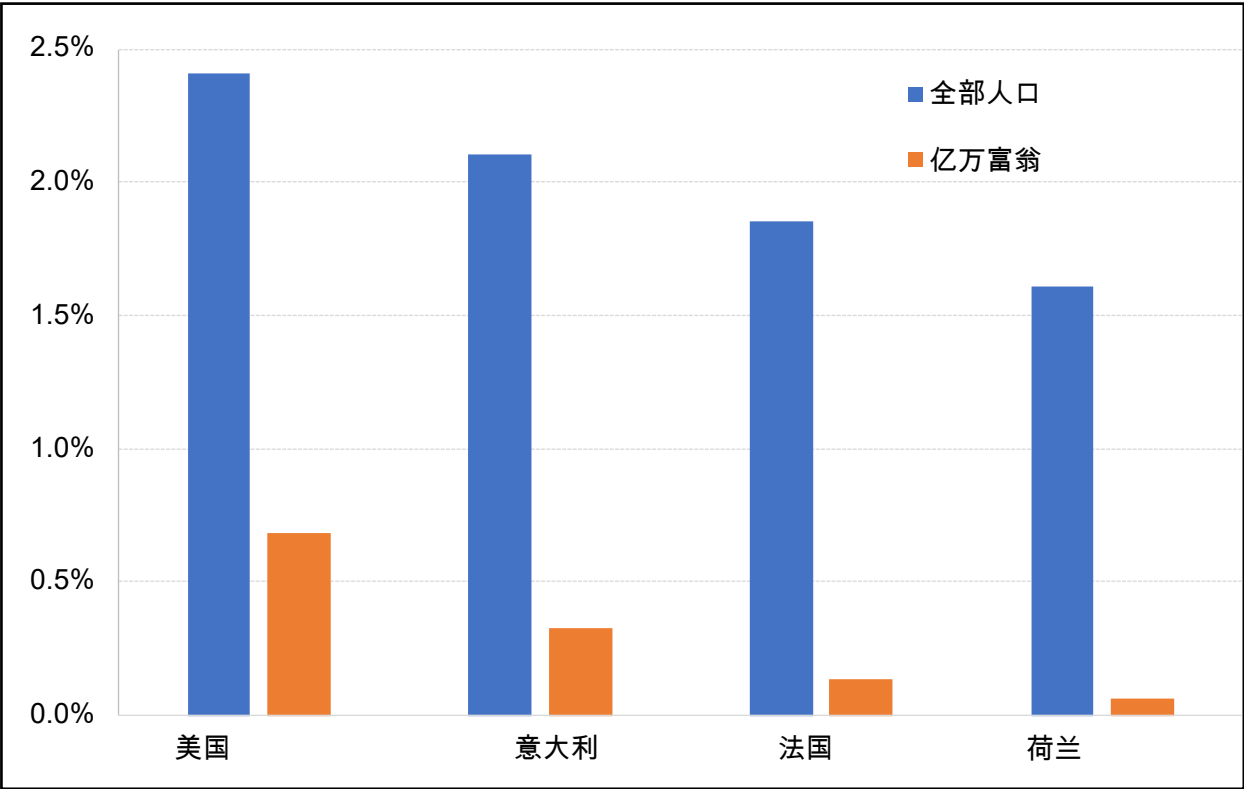
现在, 如果财富回报率 ($\tilde{r}$) 随财富增加而上升 (有大量证据表明这是实际情况; 其次, 个人所得税率 ($\tau(w)$) 随财富增加而下降), 那么超富人群相对于其财富支付的税款将少于普通人群, 这就不再处于Kesten的美好世界中, 在那里一切都会趋于稳态。通常情况下, 不会存在稳态分布, 而是会出现爆炸性路径, 导致财富的 ($\tilde{r} \tilde{D} \rightarrow \infty$)。超级富有的玩家的财富机械性地快速增长远超普通人群, 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税收功能的关键作用。 $\tau \downarrow$ (τ), 表示为不同人群财富的一小部分的个人税率。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 (τ) 功能。我之前展示过将所得税按收入划分的图表。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将所得税按财富划分的情况 (见图3)。

超高净值人群的所得税占其财富的比例实际上非常小: 在荷兰约为0, 在法国约为0.1%。蓝色条形图表示普通人的平均情况, 计算方法是将个人所得税收入和财产税收入合计, 并将其占财富的比例表示出来。例如, 2016年在法国, 所得税和财产税收入大约为2000亿欧元, 这相当于法国总财富 (约10万亿美元) 的2%。这个2%的数字将在后续部分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演示文稿中，请牢记这些数量级：平均而言，人们支付相当于其财富2%的所得税（加上拥有财富税的国家的财富税）。对于亿万富翁而言，他们支付的财富税和所得税总计在其财富的0.0%至0.5%之间。不仅回报率倾向于随着财富增加而上升，而且税收制度也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因为所得税率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急剧下降。这种机械效应会导致财富集中度呈雪崩式增长，使得富有者由于原本就富有且需支付的税款很少，更容易储蓄并积累更多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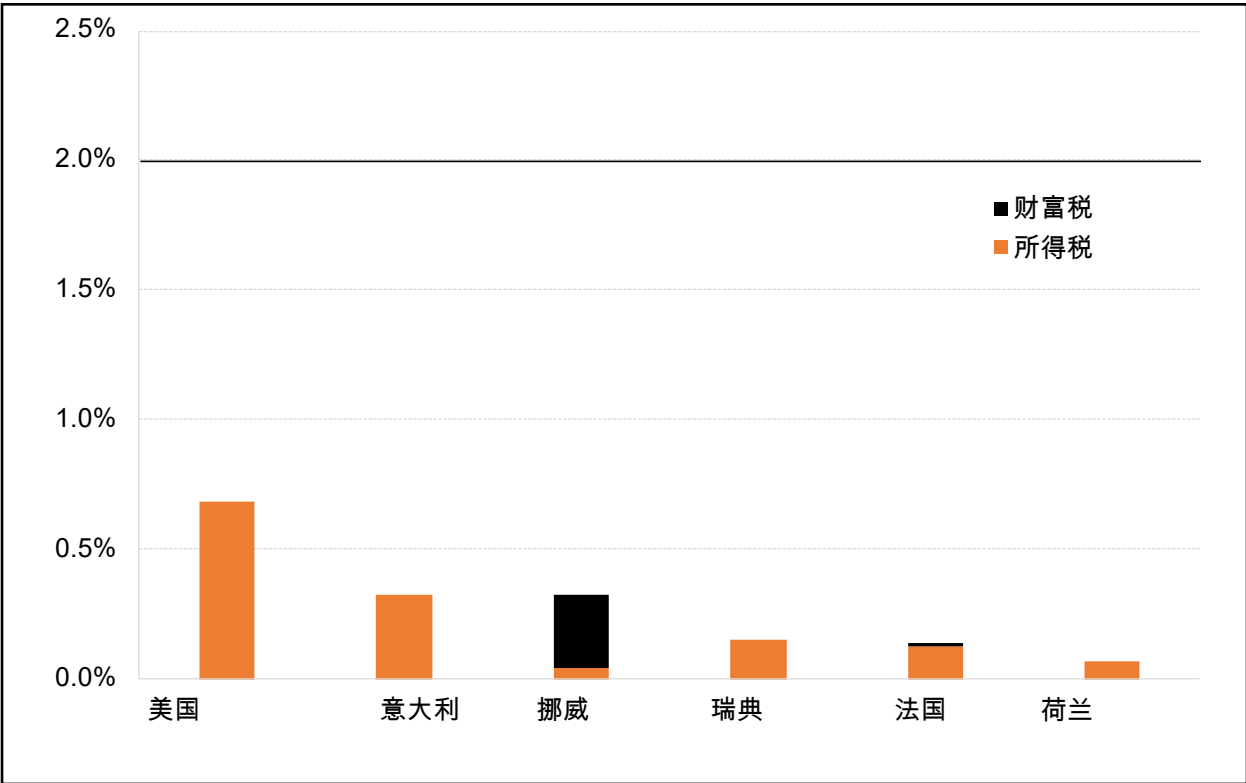
图 3 个人税收(占财富的百分比)



你可能会认为，在征收财富税的国家，亿万富豪支付的税收略高于未征收财富税只征收所得税的国家。然而，在法国，几乎无法看到财富税的贡献，因为其规模非常小：在征收财富税时，法国的亿万富豪实际上几乎没有支付任何税费。实际上，财富税反而使亿万富豪免于纳税，这一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在我看来，这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是一项相当严重的失败：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许多曾经征收财富税的欧洲国家，最富有的个人实际上免于缴纳这种财富税。我们需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与同事Marius Ring和David Seim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挪威和瑞典的情况。瑞典曾在2007年前征收财富税，之后废除了这一税种。挪威可能是实行最严格且执行效果最好的财富税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挪威，富人通过使用上限机制（如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存在的情况）来减少财富税支付的能力受到限制。这些上限规定，人们不能将应纳税收入中超过一定比例，例如70%或75%，用于总税款，包括财富税。如果应纳税收入为零，法律规定税收必须被限制在零的75%，这意味着它会被限制为零，因此这些超级富豪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款。然而，在挪威并非如此，因此挪威的超级富豪确实需要缴纳一些财富税。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我们研究的是财富税运作最佳且最有效的国家，这种财富税也远不足以让超级富豪支付显著的税款。简而言之，现有的财富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的财富税，都无法有效解决税负累退的问题。这总结于图4。

图 4 个人税收(占财富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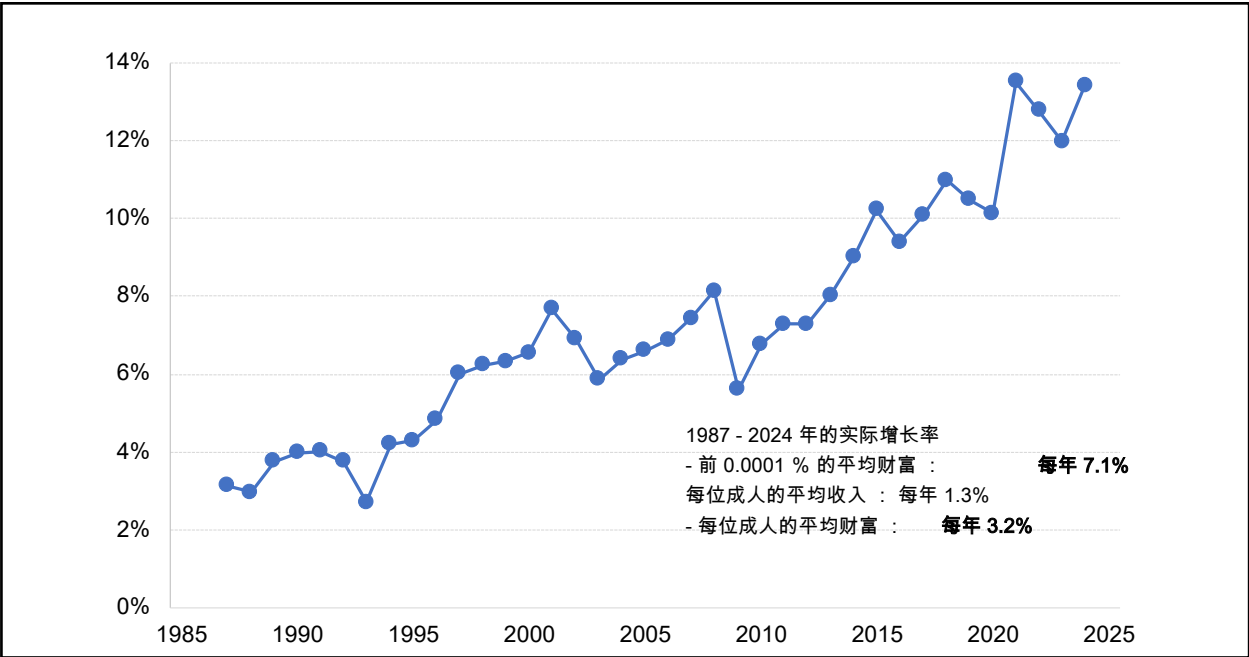
基于此，可以有以下两种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如果挪威这样的国家都无法实施有效的财富税，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实施财富税在超级富有人群中是无望的，我们应该放弃对超级富豪征税的想法。另一方面，更为建设性的视角是认为我们或许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设计出更有效的对超级富豪征税的方法。

因此，提出一项针对超级富豪的协调最低税率提案。这里的理念是，就像超过130个国家已经在2021年同意对跨国公司设定最低税率为15%，并且这一规定将于今年生效；就像我们已经为跨国公司设定了最低税率，现在让我们也为此全球美元亿万富豪设定同样的标准。确保全球亿万富豪每年缴纳相当于其财富至少2%的个人所得税。

巴西今年担任G20主席国，将这一讨论纳入了G20议程，并委托我撰写一份报告以详细阐述我们在全球避税报告2024中提出的建议。该G20报告将在月底发布。为了提前预览一些研究发现，基本提案是针对全球大约3000名美元亿万富翁（即全球约3000名纳税人）实施2%的最低税率。这些人虽然数量很少，但拥有大量的财富——约14万亿美元，并且缴纳的税款非常少。该提案旨在使这些人的财富水平与图4中的2%线对齐。由于他们与2%的水平线相距甚远且拥有大量财富，这项最低税率预计将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约为2500亿美元。

让我说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提议。要认识到它的保守性，可以看看福布斯杂志自1987年以来编制的全球亿万富豪榜单，从而观察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亿万富豪财富动态的变化情况。当然，仅关注亿万富豪本身是任意性的。今天的亿万富豪大致相当于全球人口的前0.0001%。全球大约有30亿个家庭。因此，在这30亿家庭中，大约有1/百万的家庭是亿万富豪——全球大约有3000个亿万富豪家庭。如果计算从1987年至今这0.0001%的财富总额，并按世界GDP进行调整，你将得到图5中的图表。

图 5 全球前 0.0001 % 的财富，占世界 GDP 的一小部分(前 0.0001 % = 1 / 百万 = 2, 900 个税收单位 = 2024 年的亿万富翁数量)



该图表显示，1987年，全球亿万富豪（确切地说，是当时全球最富有的0.000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GDP的3%。如今，他们的财富相当于接近14%的世界GDP。这并不是因为亿万富豪的数量增加了，因为这个群体的数量被固定为全球人口的0.0001%。如果我们仅仅统计亿万富豪的数量，增幅会更大，因为在1987年，美元计价的亿万富豪数量非常少。图表并未展示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而是展示了最顶端的0.0001%家庭的财富。这个群体从1987年到今天，其财富相当于世界GDP的3%和14%。这意味着什么？这表明，自1987年至今，该群体的平均财富以每年7.1%的速度（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增长。相比之下，全球成年人的人均收入仅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人均财富的增长略显不确定，因为有关财富的数据不如有关收入的数据全面，但大致而言，人均财富每年增长约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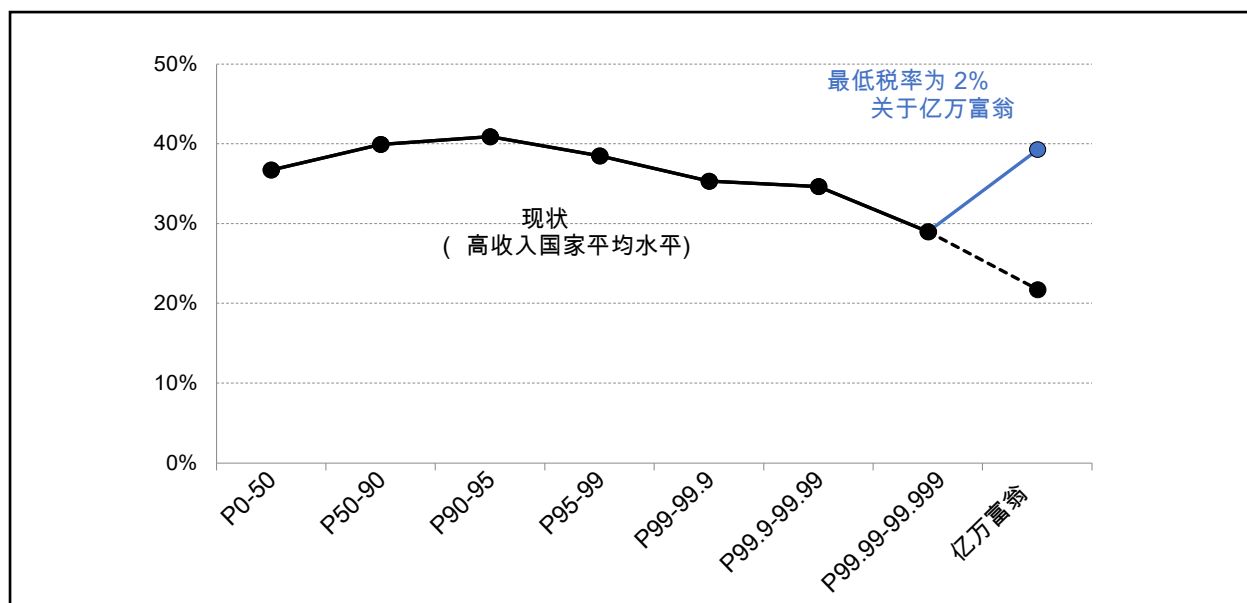
这是理解2%最低税率相对微小的原因所在。自1987年以来，平均每人的财富年增长率达到了3%，而在最顶层的平均财富年增长率则为7%。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如果他们从不支付任何税款改为支付2%的税，他们的财富将机械地以5%的年增长率增长，而不是7%。5%仍然显著高于3%。为了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这一提议并不会减少财富集中度，甚至也不会在全球范围内稳定财富不平等；它仅仅会减缓财富集中度增加的速度。因此，这正是这一提议之所以被认为是相当温和的原因。但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2%仍然比他们目前支付的0.3%要好。

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2%的增长幅度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将对高收入国家的税收累进性提供重要的保障。这是我现在要说明的内容。在这里，我将四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平均：意大利、法国、荷兰和美国，并假设这些数据代表了高收入国家的情况。假定高收入国家税收累进性的模式如下：收入分布底部50%的人群缴纳约37%的税，而亿万富翁的比例下降到约20%。这就是现状。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和数据所能测量的情况，这就是当前的状态。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对全球亿万富豪引入2%的最低税率，从定义上讲，这只会影响最顶端的那一部分人群。但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2%的最低税率足以完全消除我们所观察到的累退性：在这一最低税率得到严格执行后，他们原本缴纳22%的所得税，将会缴纳接近40%的收入税，与中产阶级的税率大致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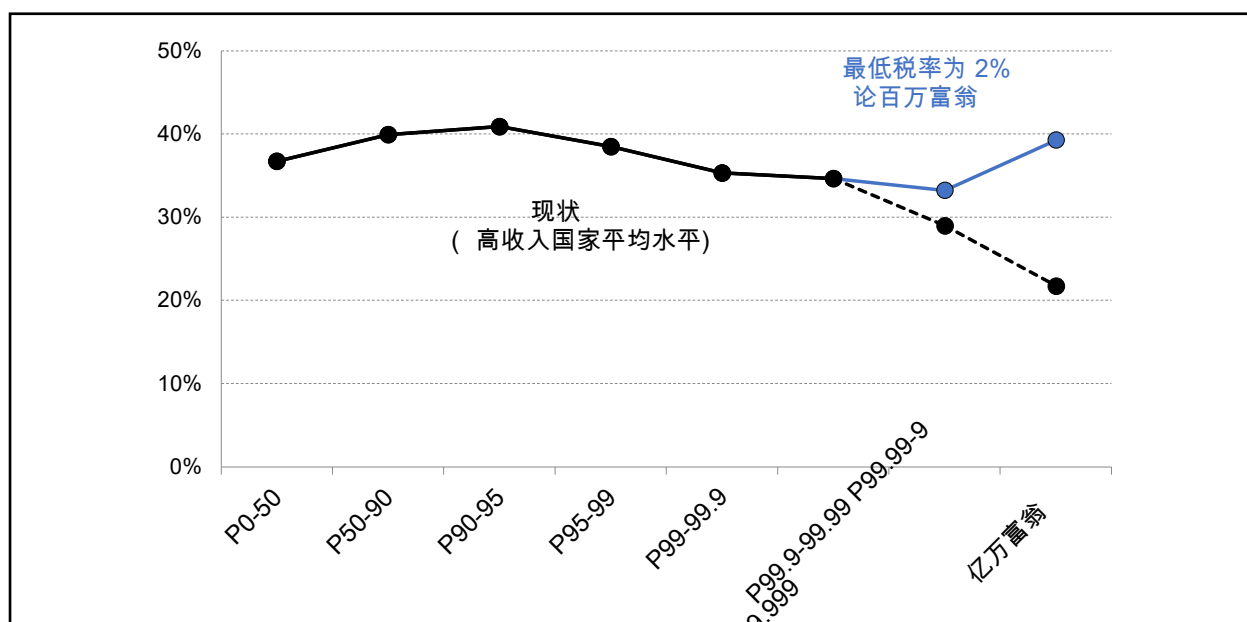
高收入阶层和上中产阶层支付。仍会在第95百分位与接近亿万富翁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累退性。

图 6 按收入群体和亿万富翁划分的平均税率(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没有理由仅仅关注亿万富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非常显眼，并且是一个小群体。这也得到了合理化，因为他们是当前税负最轻的群体。但是看看拜登总统在美国的预算，他称之为亿万富翁收入税，并且经常在电视上说亿万富翁没有支付其应缴的税款，国会应该通过他的亿万富翁收入税。然而，当你细看条款时，这并不是一项针对亿万富翁的税收，而是一项对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人征税的措施。因此，让我们考虑对准亿万富翁（净资产在99.99%到99.999%之间的人）征收2%的最低税率。这将影响这个群体，并且足以抵消我们在收入分配这一水平上观察到的部分累退性。如图7所示。

图 7 按收入群体和亿万富翁划分的平均税率(占税前收入的百分比)



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适度的比率。它不会减少不平等，但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收入，而且尽管这不足以使我们的税收制度进步，但它将抵消我们当前的一个特征

税制几乎没有人能为其辩护。我认为当人们在未来回顾那个情况时，所有人都会感到震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这样的税收制度存在如此明显的失败是没有合理解释的，通过实施这个适度的最低税率，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讨论一些稍微技术性更强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国际合作如此重要？为什么协调最低税率相较于各国单独行动能增加价值？因为主要障碍在于，在实践中对非常富有的人征税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他们可能会迁往低税率国家，或者有时会隐藏收入，尽管如今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以及国家间的信息交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自2018年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之间建立了自动交换银行信息的机制，使得隐藏资产在离岸金融中心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这种信息交换仍然不够全面。例如，它不包括房地产领域，而且有证据表明，并非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都遵守这一新规定。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扩大其范围，并更好地执行。

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国际协调以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境。即使各国之间能够完美地交换信息，仍然有可能非常富有的人迁往低税率的瑞士州，并通过这种方式逃避纳税。这与跨国公司面临的问题相同。这也是推动对跨国企业实施最低15%税率的同一逻辑。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可行的。长期以来，有关可以制定协调最低税率的想法被视为无稽之谈或象牙塔中的幻想。直到2021年，130个国家同意实施最低15%的税率。这就是经合组织双支柱过程中的第二支柱所指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税收竞争并非某种自然法则，而是我们可以选择竞争，也可以选择协调。

我们必须选择协调，因为国际税收竞争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国际竞争形式。存在积极形式的国际竞争，当各国竞争以拥有最好的大学、最佳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最好的公共基础设施时，这将惠及大多数人口。这种竞争倾向于减少不平等，并增加“蛋糕”，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福利。但是，当各国仅仅在税收方面进行竞争，通过提供较低的税率来吸引一些亿万富翁或跨国公司时，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并未增加全球资本存量，只是在国家之间重新分配资产和税基。从根本上说，这实际上比零和更糟：它是负和游戏，因为谁会从中受益？只有非常富有的人会从这些较低的税率中获益，或者跨国公司的所有者，他们通常处于收入分布的顶端。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协调而非竞争，并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想强调的是，这项协调的最低税并非财富税，尽管它与财富税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仍然坚定地属于收入税范畴。最简单的方式来看这一点是：有时这种税很少征收，但有时亿万富豪会缴纳大量的税款。也许在某一年，他们实现了大量的资本利得，或者出售了资产。任何一位在某一年内因收入税支付超过其财富的2%的亿万富豪，都不会因为这项机制而额外缴税。只有当某一年内你支付的收入税低于2%时，才会对已支付的税款进行补充，以确保达到商定的最低2%的收入税水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确实不是财富税。

事实上，从技术上讲，这被称为预提所得税。其基本理念是，如果你非常富有，就必须假定你赚取了收入。如果申报零收入，这与你的实际经济收入不符，也不符合你实际的纳税能力。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就必须假定你赚取了收入，并对这笔假定的收入征税。为了使这一机制有效运作，关键在于将最低标准定义为难以操控的标准。你最想避免的一个错误是将最低税额以收入的百分比形式表达。因为整个问题在于收入可以被操纵至零。我不是说财富无法被操纵，但如果你今天是个亿万富翁，你确实可以合法地假装自己没有收入：比如杰夫·贝索斯就声称自己有零收入。

收入：无工资、无股息、无已实现的资本收益，因此无需缴税。但对于杰夫·贝索斯而言，假装自己没有财富将会非常艰难。他们可能会通过使用信托、控股公司等方式来掩饰，但这将会更加困难。因此，财富是一个更为实际的基础，对于亿万富翁来说，它是计算最低应缴税款的最佳参考。

如何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设定一个共同的标准。尽可能多的国家——理想情况下，所有国家——能够就一个共同标准达成一致：例如，亿万富翁至少需缴纳2%的税。这一标准允许各国在国内实施时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如果各国同意这一标准，他们可以选择通过预估收入税来实施，就像我所描述的那样。或者通过针对广泛意义上的收入征税，包括未实现的资本收益，类似于拜登政府提出的亿万富翁收入税提案。或者各国可以选择通过累进财富税来实施这一标准。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只要最终超级富豪满足了达成一致的最低标准，即他们财富的2%。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多边条约。它不需要所有国家同时同意创建新的税种。只需要就实施标准做出承诺，并且每个国家在国内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施该标准，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如何实施。对于支柱二下的跨国公司15%最低税率而言，这种方式没有涉及多边条约，而是跨国公司将支付15%，并通过国内立法协调不同国家实施这一理念。

现在让我讨论实现这一想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有一个经典的关于财富估值的问题。如何评估财富的价值？如果财富像收入一样容易被操纵，那么最低税率将无效，我刚才就浪费了大家的时间。然而，研究显示，全球大约一半的亿万富豪财富是以公开上市公司的股票形式持有的，这些股票每秒都有明确可观察的市场价值。因此，这部分财富很难被操纵，这占到了总财富的一半。另一半财富又是什么呢？有时人们认为这部分财富只能是他们的毕加索作品、私人飞机和游艇。这些确实存在，但仅占一小部分。另一半主要是大型未上市公司的大额股权。我们谈论的是那些规模庞大、未上市的公司，而不是小型的家庭小企业。这类大型私有企业的价值可以通过参考类似公开上市公司的估值方法来评估，即通过市盈率、市售率和市净率等指标来进行。金融分析师们一直在伦敦、纽约、日内瓦、巴黎等地进行这样的工作，评估私有企业的价值。这种金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认为，如果国际上的讨论继续进行，有机会使这些规则趋于一致。但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发明轮子，因为已经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小部分，如我所说，这部分非常小。如果你问我，我认为有可能对毕加索的作品进行估值，因为这些作品将被保险，因此可以使用保险价值来进行估值。但我也愿意承认，并非所有东西都能完美衡量和估值，可能会存在一些噪音和不完美之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即使在估值不完美的情况下，基于财富的最低税率仍将是现状的巨大改进。

关于避免和规避税收的问题，我们刚刚看到，在有财富税的情况下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在有收入税的情况下也没有支付一分钱。这里的出发点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关于税收规避的关键教训是，税收规避就像税收竞争一样，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从根本上依赖于政策选择。这一观点最显著的例证在于银行保密制度的变化。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声称他们无法对离岸避税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有些人想将资产藏匿于瑞士，如果瑞士银行希望实施非常严格的银行保密规则，政策制定者对此无能为力。这种情况自2018年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那些曾宣称永远不会共享数据的银行家开始自动向超过100个国家发送数据，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可以选择容忍甚至鼓励税收规避，就像我们可以选择创建新的国际合作关系，也可以选择防止税收规避。

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上扩大银行信息交换，包括房地产等领域。更广泛地说，从历史上财富税的经验来看，特别是欧洲财富税的灾难性失败经验，如果在财富税中引入豁免和漏洞——例如，如果免税私人企业并允许它们仅按市场价值的很小一部分纳税——这将是灾难。因为这些非常富有的人愿意花费大量资金来制定税务规划策略。如果你告诉他们可以通过某些漏洞避免征税，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漏洞。显然的答案是不允许他们使用漏洞。所有人都可以同意，对于亿万富翁没有任何形式的豁免是必要的。所有财富都将按照市场价值纳入征税基础，没有任何例外。在之前展示的模拟中，我保守地假设仍然会有15%的避税和逃税。如果遵循这些原则，没有漏洞，并加强信息交换，那么我们可以减少更多的避税和逃税行为。

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在协调不完善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如果某些国家拒绝实施这一标准怎么办？虽然全球参与是最理想的，也是目标，但并非必要。最低税率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单独实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最低税对跨国公司的支柱二条款。美国尚未实施该条款，并且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也不会实施。中国也是如此。然而，这一情况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不仅已经开始出现，美国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仍需按至少15%的利润缴纳所得税，即使这些税款不会被美国或中国征收。因为在支柱二规则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所谓的UTPL（未付税款规则），它实际上表明，参与实施最低税的国家有权收取那些未参与国家选择不征收的税款。这很聪明，因为它为所有国家加入提供了激励。不加入就意味着让其他国家有机会获得本应属于自己的税收收入。美国和中国未征收的税款将由欧洲国家、南半球国家和其他参与该协议的国家来征收。

从根本上说，目标是模仿这一方法并将这种逻辑应用于亿万富翁。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做到这一点？跨国公司的方式是，如果一家跨国公司在某个国家有员工或拥有资产，那么该国有权收取部分税收缺口，即该公司未向美国或中国缴纳的税款。我们应该对亿万富翁采取同样的做法。假设美国拒绝对其亿万富翁征税，那么这些亿万富翁经常居住的国家、他们拥有资产的国家，以及他们投资组合非常多元化的国家，包括房地产和金融资产，这些国家应该有权收取至少部分美国或其他国家（如瑞士）选择不征收的税款。这一逻辑甚至可以进一步扩展：这些亿万富翁的财富来源于拥有跨国公司。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所在地、资产所在地以及销售额来确定，亚马逊、苹果或Facebook等公司所在国家可以收取本应由其他地方未征收的税款。

关键理念是需要一个最后的税务征收机制。如果有这个机制，整个体系就能为各国加入协议提供激励。在某些国家不加入的情况下，它能提供一种后备保障。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我们将面临问题，因为又回到了一些国家选择不实施最低税率的“竞相降低标准”的困境，从而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协调的最低税率是一项强有力且实际上是最有效的措施，用于保护收入分配顶端的税收进步性。我们确实受益于过去10-15年国际税制合作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尽管还不够充分：自动交换银行信息、跨国企业的最低税率、这些最后的税收征收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建设。得益于所有这些进展，我所描述的针对亿万富翁的最低税率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可行，并且可以成功实施。非常感谢。

2 解决气候不平等

Esther Duflo

哈佛南丁格尔·贾迈勒共事主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迈勒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 联合主任，麻省理工学院 (MIT) 阿卜杜勒·拉蒂夫·贾迈勒贫困缓解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巴黎经济学校校长，CEPR

埃斯特·杜福尔讨论了迫切需要财务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将因发达国家消费引起的气候变化后果而遭受不成比例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杜福尔提出了将从世界上最富有的3000人中获得2%财富税收入以及对最大跨国公司额外征收的6%税款用于个人和社区转移支付的建议，以资助社会保护措施，抵御气候冲击。杜福尔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实现气候适应，并指出巴西在推动这一提议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从头条开始有点便宜，但我还是会这么做。法国报纸的一个头条 *Le Monde*，日期为6月4日，是“气候混乱”(“混乱的气候”)。这一记录显示了过去12个月的数据，并且现在非常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超过1.5摄氏度。另一个或许不太常见的头条新闻，日期为6月3日，引用了目前在波恩进行的讨论。这里的主要议题是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气候资金。虽然低收入国家之前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但将其作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则更为不同寻常。显然，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从积极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表明了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也标志着某种运动的开始。是时候敲响警钟了，也许有人会愿意倾听。另一个来自6月2日的头条新闻，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结合了上周最大的两个头条新闻，即印度选举和印度的热浪：有33名投票代理人在高温中丧生。显然，在这次热浪中，许多更多的人在印度死亡，当地部分地区气温一度超过50摄氏度，这种温度在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情况下难以想象。但是，将这一情况与民主运作联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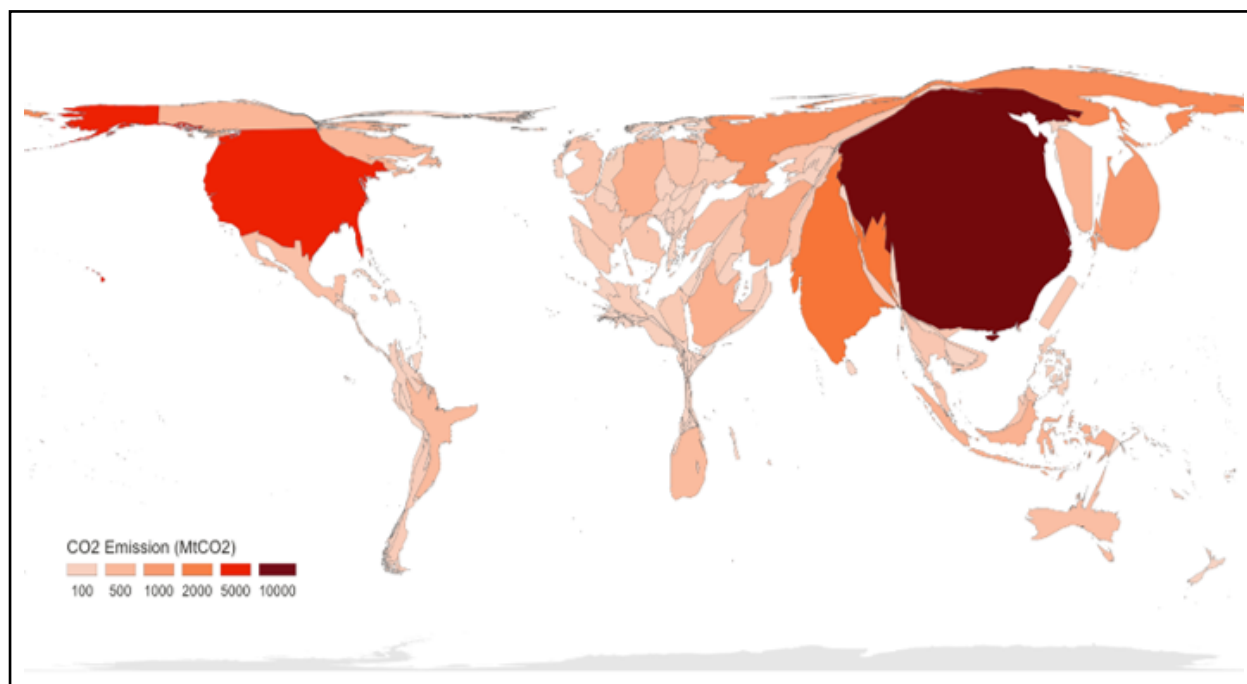
我也感兴趣的是，至少自从我关注这个话题以来，第一次，主要报纸如 *Le Monde* 在法国和 *纽约时报* 在美国，媒体正在报道高温对贫困人口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早已知晓，但从未被提及。总体而言，直到现在，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它将如何影响我们(西方人)。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关人们面临的困难、需要继续工作、无法请假或无法工作的报道，这些是我们撰写论文的内容终于开始进入富裕国家的政治讨论。我认为这非常有趣，并且需要进一步发展。

今天我想做的就是将这些文献整理在一起，主要是为了提出一个提案，类似于加布里埃尔·朱克曼昨天所做的那样，使这次演讲具有政策角度甚至政治角度。第一步涵盖的是关于谁应对气候变化负责的问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波恩谈判中指出，他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把这个责任强加给了他们。这是真的，因为历史上导致气候变化的责任主要在于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表明一吨碳的影响基本上是线性的，但这种线性关系存在于累积排放量中；它并不会消失。因此，大气中的所有排放量都来自于今天工业化且富裕国家所选择的发展路径，或者至少是遵循了这种发展路径的国家。因此，存在不同的历史责任。富裕国家会同意这一点，但他们也会辩称那是过去的事，现在责任已经更加分散。

特别是在图1中，该图来自贝atrice Weder di Mauro昨天的presentation，特别突出了中国。在这里，排放量更大的国家被描绘得更大和更暗，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比。

中国封锁，引发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很大，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中国”，尽管历史记录不佳，但如今问题主要在于中等收入国家，而未来将是贫困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并开始排放，这是我们应当担忧的。首先，从道德层面上来说，你未必会认同这种论点，而且即使作为一种描述当今世界的方式，它也并不十分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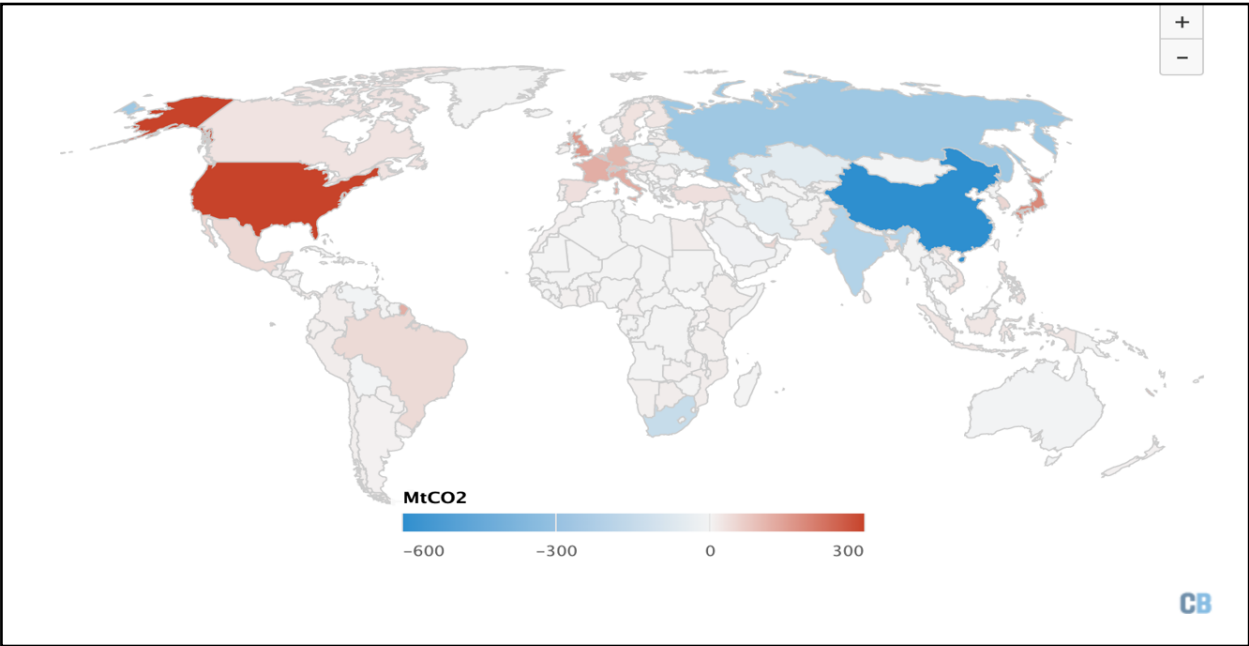
图 1 CO2 排放总量



撇开历史不谈，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排放情况，当我们说中国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确实如此）时，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这些二氧化碳主要是用于制造后来被运往欧洲的汽车（而不是美国，至少短期内不是）。许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被消费在其他国家的。图2是通过结合生产矩阵和贸易数据制作的，显示了中国虽然生产了许多汽车，但随后又出口了这些汽车。因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出口国。印度也是如此；如果你在这张地图上是蓝色的，说明你出口的二氧化碳比你进口的多。美国和欧洲之所以呈现红色，是因为它们大量进口了本国不生产的商品。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修正，因为关键在于消费地而不是生产地，因为最终的决策都是在消费地做出的。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定义碳足迹，并在国家层面计算碳排放时通常反映的内容。第一个衡量标准是使用排放；即实际产生的排放量。例如，如果你驾驶电动汽车，你的使用点排放为零，因为你没有贡献。即使考虑电力本身，因为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不使用化石燃料。第二个衡量标准考虑了必须生产这种电力的事实——如果欧洲能够主要使用清洁能源，那么电力的碳含量也会有所改善，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因为我们正朝着更多可再生能源方向发展。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衡量标准，即我们应该使用的概念性衡量标准——总碳足迹或消费排放——我将这两个术语互换使用，它包括了生产那辆（电动）汽车所需的一切。显然，这是相关的关键指标。

图 2 CO₂ 出口量



不幸的是，第三项措施在个人层面难以计算，并且在国家层面难以汇总，因为需要确定碳含量和每个人消耗的内容，而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无法在个人层面完全进行这项计算，但人们所做的是——尤其是卢卡斯·尚克尔及其合作者使用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数据——他们试图通过假设将人们的消费与其收入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利用根据收入水平确定消费内容和这些消费的碳含量的调查数据。因此，我们有调查显示每个人的碳足迹，然后可以计算与收入相关的弹性，我们发现弹性不是1。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的消费结构会相应地变得更绿色，因为汽车在他们的预算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但这也不是零，而是非常高的，因为越富有的人消费越多，他们消费得越多，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越多。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指标，就可以将其与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全球收入分布相结合，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计算出人们对全球总碳足迹的良好估计。

当你这样做，并按照收入或消费排放量对人们进行排名时，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50%规则，这一规则最初出现在Lucas Chancel和Thomas Piketty的一篇论文中。¹（见图3）。而且这是双向的。因此，全球前10%的最大污染者负责几乎50%的全球排放量，而全球后50%的人口则负责大约10%的全球排放量。这种双向关系主要是靠运气实现的，但好在只需记住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按国家来划分，这给出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结果，其中全球前1%的人口消耗量约为后50%人口的100倍。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统计数据是：居住在美国收入分布最高10%的美国人其总的碳足迹是生活在非洲收入分布最低一半的人的122倍。这基本上描述了Ishan Nath之前提到的观点，即最贫困人口对气候变化几乎没有贡献，而当考虑到消费排放时，这一贡献更是微乎其微。

¹ Chancel, Lucas 和 Thomas Piketty(2015), “碳与不平等：从巴黎到京都”，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工作文件，N° 2015 - 7。

图 3 上一篇：10-50 规则：全球 10% 的最高污染者占全球排放量的近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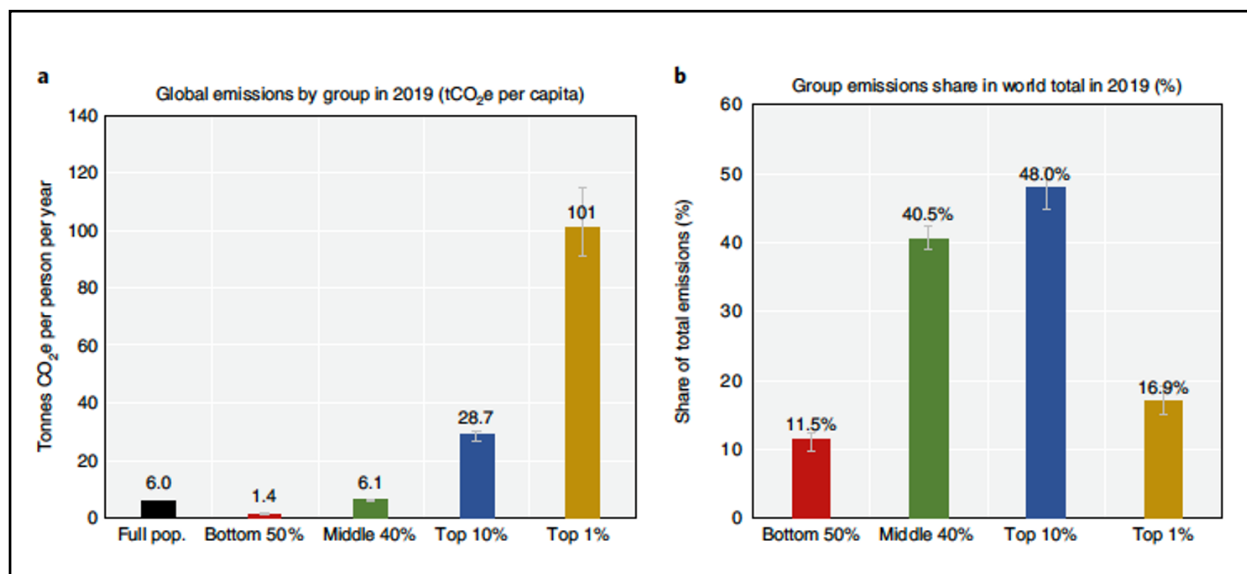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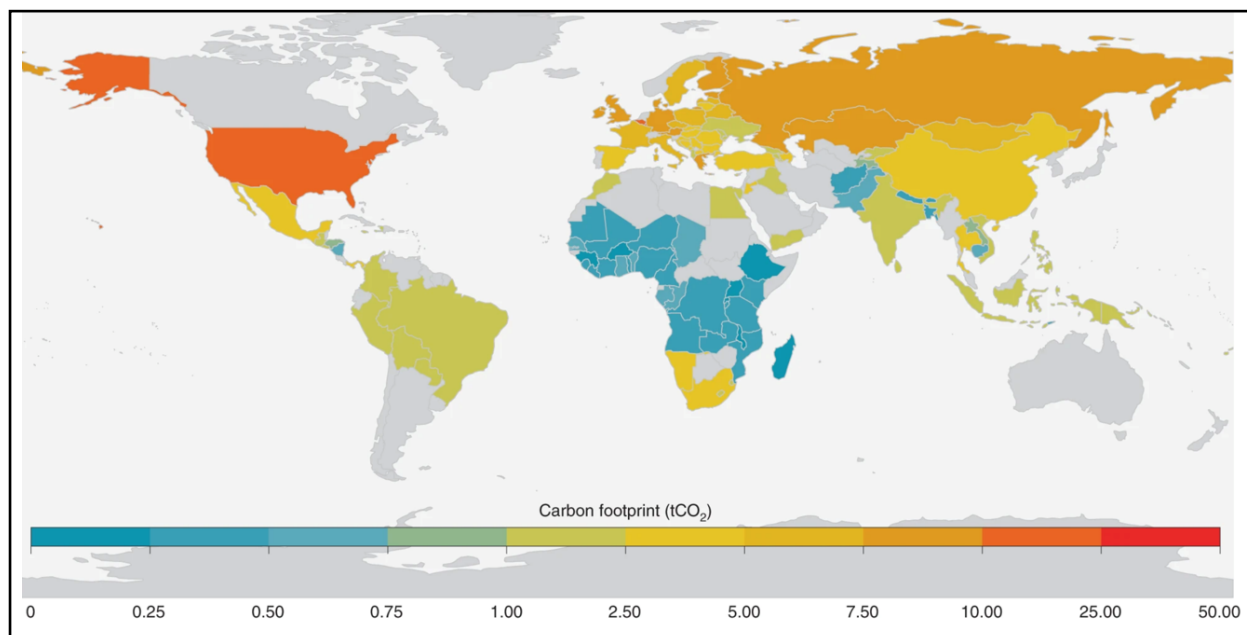


图 4 高污染者主要生活在富裕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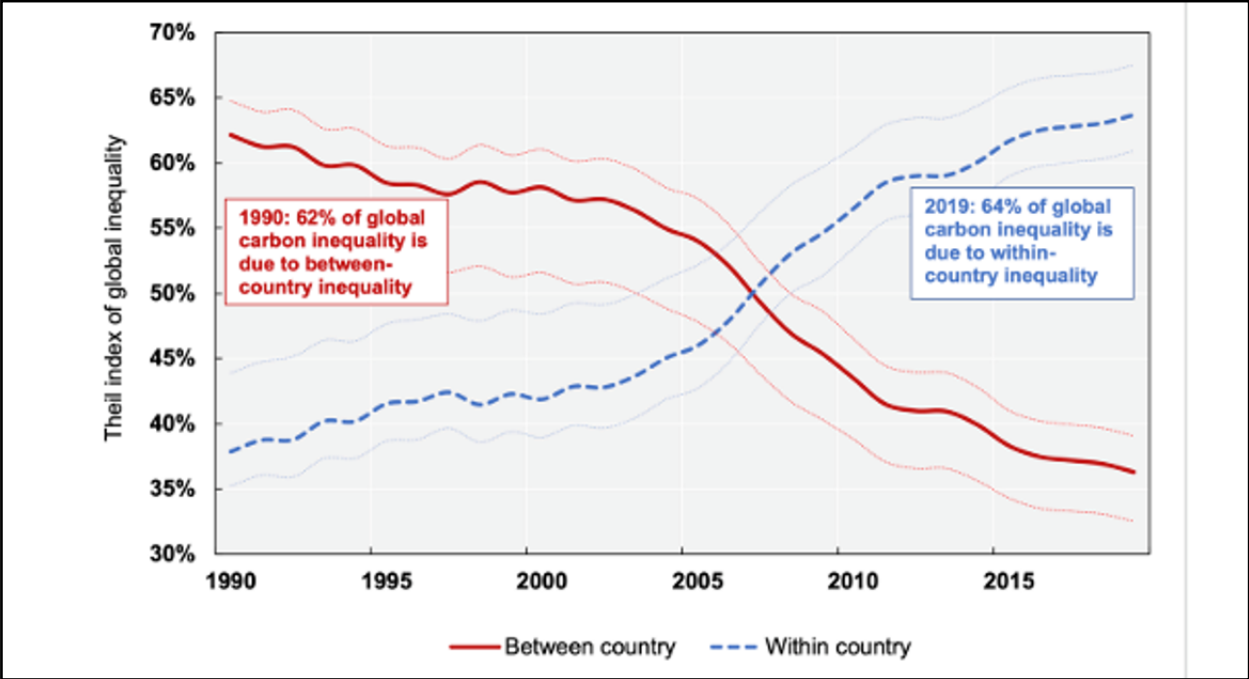


高排放国家主要位于富裕国家，如图4所示，该图按排放量着色。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不包括南非）对气候变化几乎没有任何贡献。

有趣的是，这在 Lucas Chancel 和他的合著者的新作品中得到了体现² 在国内不平等现象日益重要，如图5所示。换句话说，在印度，存在非常富裕的人口，并且他们的消费量很大：他们拥有许多楼层的大房子、多辆汽车等等。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欧洲，尽管每个人的消费足迹有所下降，但碳排放不平等现象却在增加。在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各国之间，而现在大约三分之一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在国内，三分之二则发生在各国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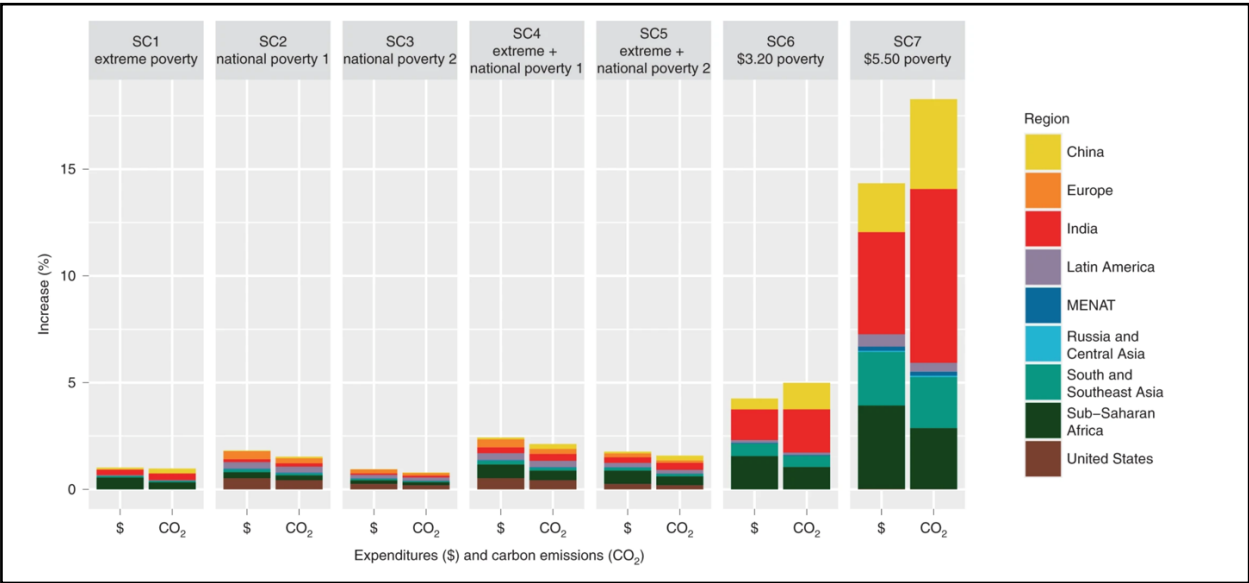
² 钱塞尔，卢卡斯，菲利普。博特，坦克雷·沃伊图里兹，2023年气候不平等报告；钱塞尔，卢卡斯，菲利普。博特，坦克雷·沃伊图里兹，征收财富税解决三重气候不平等危机的潜力，气候变化自然，2023。

图 5 国内不平等越来越重要



这意味着我们在考虑如何归因责任时必须将其纳入考量。这意味着什么？其中一点是，消除贫困和减少排放之间并不存在权衡关系。认为为了气候变暖的原因而无法让非洲和孟加拉国的人们变得更不贫穷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个非常低的基础和消费水平开始的，即使我们设法将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每人2美元（这是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这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富裕水平——从如此贫穷的起点出发，这只会使排放量增加约2%，见图6。因此，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并没有权衡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存在一种风险，即那些刚刚意识到气候变暖是一个问题并突然转向这一领域的人员可能会将许多人置于困境之中。我们必须不要抛弃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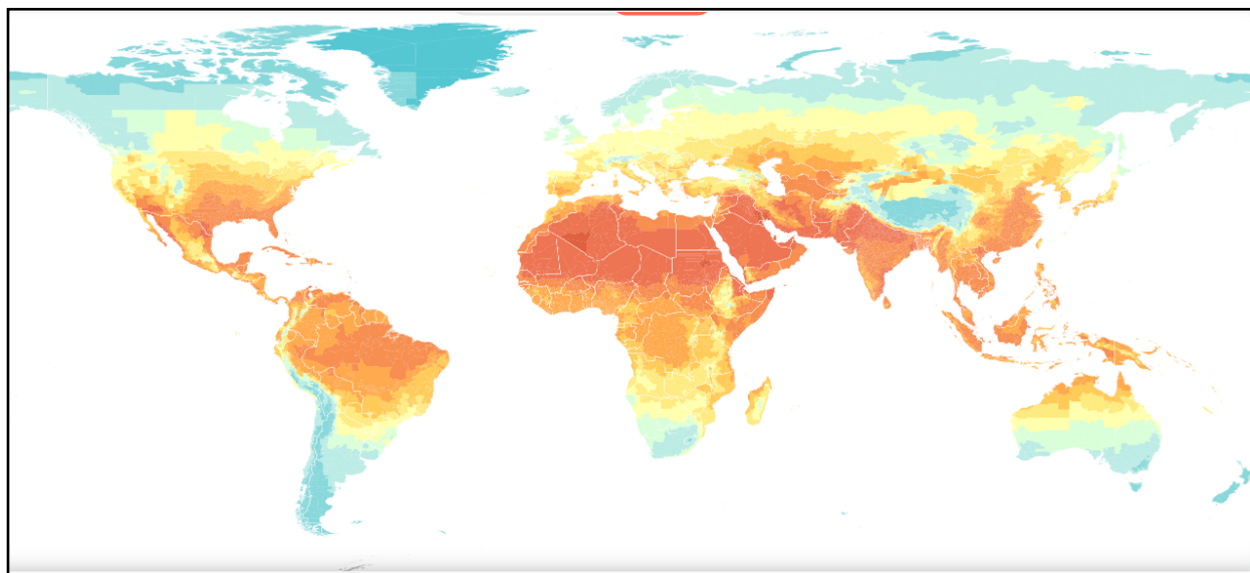
图 6 消除极端贫困只会增加 2% 的排放量



资料来源：减贫对国家和全球排放的影响

责任分配不均，世界上贫穷的人几乎不对任何问题负责。然而，气候变化的成本却主要由贫困地区承担。这是为什么呢？首先，贫穷国家往往位于今天已经很热的地方。图7显示了全球影响实验室的当前温度数据。数据显示，贫穷且人口众多的地方往往气温较高。许多贫困人口生活在今天非常炎热的地方。因此，到2050年和2100年，随着地球变暖，那些将经历大量高温日（这里定义为超过35摄氏度；如果我们将阈值设定为50摄氏度，将会得到更少但更加集中于人口稠密、极度贫困地区的地区）的地方大多位于贫穷国家：巴西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特别是从西非到苏丹和东非horn of africa；以及南亚北部——包括巴基斯坦、北印度和孟加拉国。此外，虽然这些地区往往也非常潮湿，这意味着实际感受到的温度（这对人体有害）会更糟。尽管整个地球不会升温得完全均匀（但在初始假设下，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显然真正重要的是一些非常炎热的日子，这些日子将主要影响贫穷国家。

图 7 较贫穷的国家往往处于较温暖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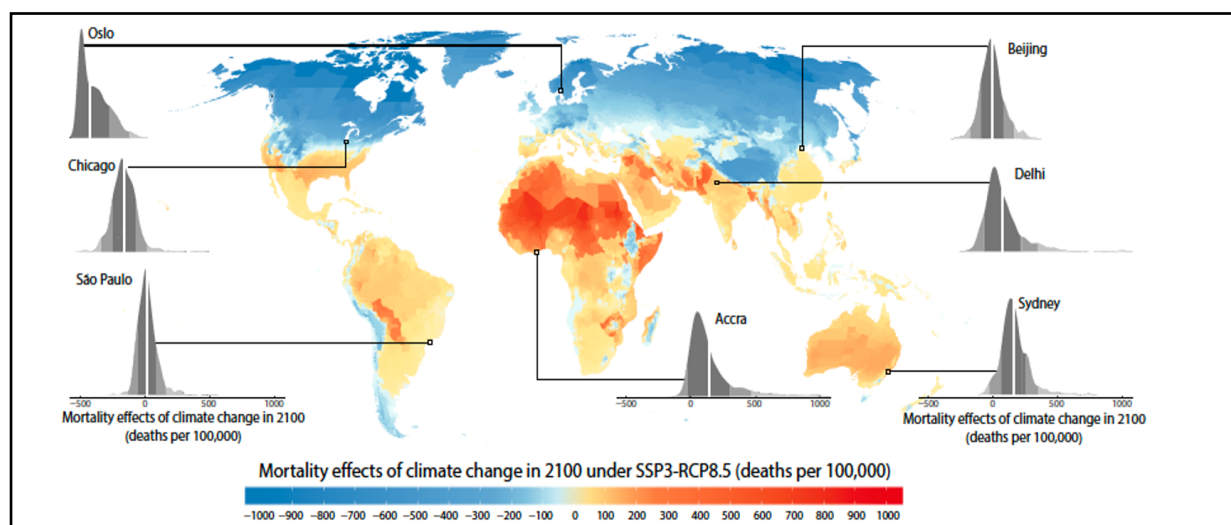
第二个事实是我们并不处于一个平等的位置来应对这种非常高的温度。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但在此之前，天气本身就已经存在差异。《气候影响实验室》的工作（<https://impactlab.org/>）比较了相似的地方，例如印度的两个区：其中一个在某一年恰好更热或有更多高于35度的热天，另一个在下一年则更热。在某一年恰好更热的那个区相对而言死亡人数更多。这仅考虑了温度在正常范围内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关于灾难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高温并不被视为自然灾害。对于洪水或干旱等灾害，已经自动实施了社会政策，但对于高温却没有这样的政策，尽管高温也会夺走生命。如左图所示，这里展示了影响效果的一种版本，即与参考温度20度相比，热天数量的影响在炎热和寒冷地区以及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作用。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人们习惯了较高的温度后，他们会积累经验。例如，法国第一次热浪导致很多人死亡，因为我们不知道需要检查年迈的祖母。而第二次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较少，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该怎么做，因此出现了从经验中学习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有些非常迅速，比如这个例子，但有些则可能较慢，因为需要投资。这不仅是从寒冷到炎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的差异梯度。对于那些已经很热的地方，低收入地区的人们知道如何应对极端高温，但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设备。例如，在德克萨斯州，人们可以开着空调车从空调房里去到另一个空调房。

在条件办公室中，它们大多数情况下会保持良好状态，或者至少不会死亡。然而，如果巴基斯坦非常炎热且人们没有空调，他们仍需继续工作，即使大部分工作并非农业（如建筑），这可能会变得更为致命。

当将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时，你就得到了图8中的地图，这可能是最近几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地图之一，并且真的促使我对此问题兴奋不已。这张地图来自气候影响实验室（Climate Impact Lab）。³ 这表明了到2100年的预计死亡伤害情况，按地理区域划分，结合了较贫穷国家将经历更多高温日且这些高温日将在较贫穷国家导致更多人死亡的事实。颜色编码显示红色区域的损害程度更高，而蓝色区域则显示出益处。

图 8 到 2100 年的死亡率成本



有人问，在法国北部或瑞典这样的老年人口比例很高的地区，是如何获得收益的。答案是，当夏季非常炎热时，冬季也会相对温暖，许多老人因寒冷而死亡。因此，人口结构对贫穷国家来说并不总是不利，因为它们受益于较温暖的冬季。由此可以得到这张地图，所有成本都在非常贫穷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巴基斯坦、北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些数据反映了平均情况，但这里的细小钟形曲线显示了变异性，因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具体估计存在许多未知数和不确定性。这些是潜在情景，其中一些情景确实令人担忧，但完全有可能。综合这些信息，气候变暖可能导致每10万人额外增加73例死亡，这听起来不多，但到2100年这将影响大约600万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一数字相当于所有传染病死亡人数的总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根除疟疾和肺炎等疾病，这一数字仍然如此之高。等等，我们只需考虑热量的影响即可逆转这一点。其次，它对能否从这里绘制出来的高排放情景转变为较低的排放情景（尽管仍然不是非常低，但较为适度）非常敏感。这明显强调了努力的程度，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关于一吨碳的呈现有关。⁴，这每一件事我们都必须去做，因为不必追求完美。效果是非线性的，即使避免一点点也是巨大的收益。这是我们要带走的一个信息：无论我们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世界中能做到什么，一吨二氧化碳对全球变暖有线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对损害产生了远超线性的影响。所以这是我希望你们记住的一点。

3 <https://impactlab.org/>

4 Christoph Semken, 减排的边际影响：估计、信念和行为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排放是由富人行为和选择造成的，而死亡成本则由穷人承担，从基本的道德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我想计算这种不可接受的程度：如果我们想要为这种现象定价，我们能做到吗？如果我们愿意对“一条统计生命的价值”做出一些假设，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虽然以金钱来衡量人的生命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这样做。例如，在决定建造新桥梁时，我们会将挽救的生命数量与成本进行比较；在决定因COVID-19关闭城市时，我们会将经济成本与挽救的生命数量进行比较。为此已经存在了一些数据。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使用的人均生命价值约为1000万美元，卡尔顿大学 *et al.* paper⁵ 利用这种方法来估算一吨碳的影响。追踪一吨碳对温度的影响，再从温度影响到死亡率，并对死亡成本进行定价，即使你不喜欢根据GDP调整后的1000万美元，你也会得到每吨37美元这个数字。这个数值可以与生产排放结合，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碳足迹计算方式；相反，应与消费排放结合，这对欧洲来说意义重大。这样，每年140亿吨的损害乘以每吨37美元的成本，总损失约为500亿美元，这代表了美国和欧洲合起来每年对贫困国家因死亡造成的损害价值。这并没有涵盖所有可计算的损害，但我认为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了这种代价，即这是我们选择生活方式的价格标签。这使得政治问题变得棘手，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瑞典的孩子们仍然需要意识到瑞典也存在问题，因为他们需要继续倡导这一点——最大的问题将在低收入国家出现。然而，主要的行动空间仍然在北方，因为那里消耗了大部分商品。

我们是否展现了处理此类问题的强大能力？我会说没有：新冠经验表明，我们在分享解决问题的方法方面并不擅长，反而更善于分享问题本身。图9中的左侧地图展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对COVID-19疫情的额外支出和放弃的收入”，这实际上是疫情期间政府为支持公民而采取的财政支出措施。可以看到，包括法国在内的富裕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支持其公民，这是非常好的。平均而言，在新冠疫情期间，富裕国家约有27%的GDP用于财政刺激措施。对于法国来说，总统可以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并举债应对。但如果你在多哥，并试图宣称“不惜一切代价”，金融市场则会拒绝。因此，低收入国家在疫情期间仅将自身较小GDP的2%用于财政刺激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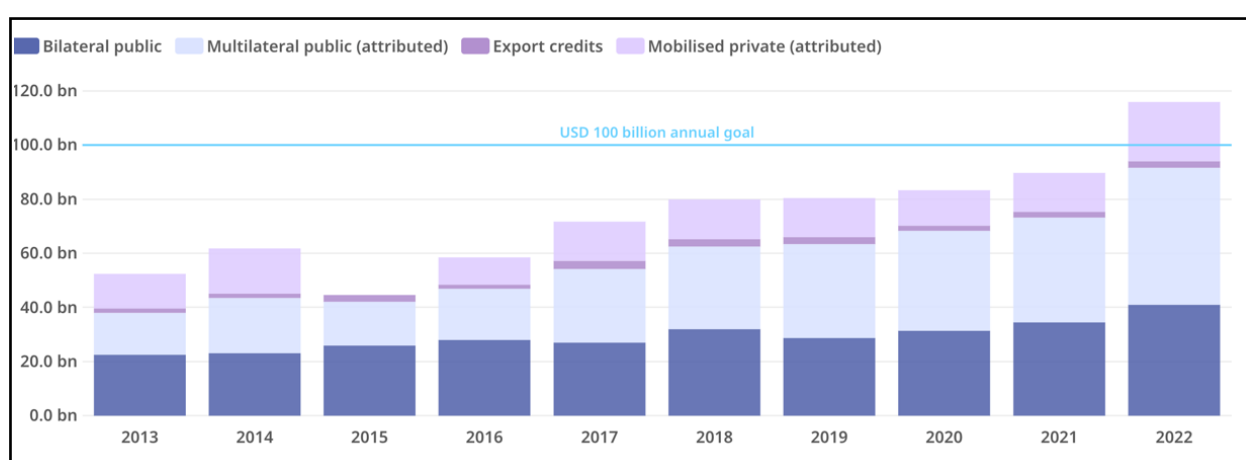
在COVID初期，阿比吉特和我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我们需要为贫穷国家制定一个马歇尔计划，以便在疫情结束后能够迅速重启经济。二战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是最被破坏的地方，在有投资的情况下也能迅速追赶上来。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实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主张也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以应对贫穷国家的需求。这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如果美国希望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达到撒哈拉以南非洲GDP的27%，他们需要在财政支出上投入相当于自身支出的10%。10%虽然不是微不足道，但也不是天文数字，所以从财务角度来看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对贫穷国家的援助流入量几乎没有增加。此外，众所周知，疫苗的故事也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我们在一次G7会议前夕撰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帮助贫穷国家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因为这将表明我们愿意提供帮助，并且我们认为这对于气候变化合作至关重要。然而，关于疫苗的会议接踵而至，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自那时起，气候变化谈判变得更加困难。那么，我们是否有所改变？也许没有。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明确宣布，美国绝不会支付任何气候赔偿。当然，这指的是过去的赔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未来不会做出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提及历史的原因；我认为着眼于未来更为明智。

5 卡尔顿·特马玛, 艾米尔·吉纳, 迈克尔·德尔加多, 迈克尔·格伦斯特龙, 特雷弗·豪泽, 索罗门·香, 安德鲁·赫尔特伦, 罗伯特·E·科普, 凯利·E·麦库斯克, 伊什安·纳特, 詹姆斯·赖宁, 阿什温·罗德, 河泳熙, 阿尔维德·维亚内, 姚佳, 坎, 张天博Alice

评估气候变化对全球死亡率的影响，考虑适应成本和收益，季刊

在COP28上，达成了一个半突破性的协议，称为“损失和损害基金”，各国最终同意就设立一项基金来帮助贫困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进行投票。一个倡导团体有理由认为，该基金每年需要4000亿美元。他们将这一需求与COP28上实际承诺给损失和损害基金的资金进行了比较，后者仅为7亿美元，两者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此外，这7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有资金进行了重新标签，并非新增资金。因此，在COP28基金中，富裕国家绝对否决了任何义务性承诺，因为它们不愿意承担一个未知规模的责任。另一方面，自愿转移是决定的内容，这需要每个国家的议会、公民等批准预算，这显然不太受欢迎：例如，目前很难想象法国政府试图说服法国公民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损失和损害基金。

图 9: 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金额
国家，十亿美元



Note: 2015 年私人金融系列的差距是由于增强方法的实施。因此，私人

2016 - 22 年度的流量不能直接与 2013 - 14 年度的私人流量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 (2024) - 2022 年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气候资金

总体而言，向贫穷国家提供资金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记录并不出色。2013年，承诺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尽管花了些时间，但最终在2022年达到了这一目标，如图10所示，该图来自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然而，当你审视这些资金是如何筹集的时，你会发现超过一半的资金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这些贷款主要来自公共机构，并主要用于减少排放项目。在许多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减排潜力大的国家进行减缓项目，但它与补偿气候变化无关，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给人们提供贷款来为我们工作，因为加纳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影响与法国减少一吨二氧化碳对世界和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同的。将贷款发给加纳以进行减缓努力并不能算作履行我们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路透社》最近对经合组织报告及其自身研究的分析指出，这些贷款不仅是以市场利率提供的贷款，而且还有额外的110亿美元需要借款国购买。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以市场利率向人们提供贷款，让他们购买我们的设备来进行减缓努力。我们不能将任何这些内容算作真正履行了我们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偿还我们不断增加的道德债务的程度。

如何推进？我在思考几种政策障碍，并且考虑了如何从概念上解除这些障碍。首先是如何平衡强制性和自愿性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如何使用资金的问题。我们需要承诺建立一种机制来筹集资金用于设立一个损失和损害基金，该基金专门设计用于为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及中等收入人群调整提供资金支持。这在国内外都是公平的，无论是在筹集资金的方式还是用途方面。

它已经被分配。理想情况下，它会提供一些激励措施以中途进行调整。我考虑了两种情景：一种是我们尝试筹集5000亿美元，另一种是我们筹集之前承诺的1000亿美元。这两种提案都基于已经进行的现有谈判，因此我认为这并非空想；我认为它们有可能实现。

第一个提议是以最低税率针对最大跨国公司设立历史性的里程碑。这些确实是最大的跨国公司，营业额达到75亿美元，大约涉及几百家公司，并非更多。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最低税率为15%，而最初提议的是21%。因此，我的第一个提议是将这一税率从15%提高到21%，这每年可以带来2910亿美元的收入（即使欧盟独自实施，不包括美国，仍然会增加2000亿美元）。第二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阅读欧盟税观察站提出的对全球最富有的3000人征收2%财富税时产生的，Gabriel Zucman昨天提出了这一提议。这相当于对其财富收益征收30%的税，这是一个适度的税率：确保他们从其财富中获得的收入所缴纳的税额与中产阶级因劳动收入而缴纳的税额相同。Gabriel讨论了如何筹集资金，而我的想法是如何支出这笔资金。这笔钱还将带来额外的2140亿美元。通过针对最大跨国公司和最富有人士的税收，我们达到了每年500亿美元的目标。

是不是有点疯狂？我个人也觉得有些疯狂，或者至少认为这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但我们现在有巴西大使馆的代表在这里，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巴西的领导作用。巴西基本上在二月率先接受了向亿万富翁征税的想法，并且在四月邀请我到G20财政部长会议上去介绍将这一想法与潜在的企业税增加挂钩的提议。之后，巴西财政部长哈达德真的对此非常重视。正如加布里埃尔昨天指出的那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带头推动国际合作提案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和趣味性。当然，这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上周，耶伦国务卿特意出来表示她并不喜欢这个提议。当被问及澄清时，她表示也许对视频征税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是分配给其他国家则不行。但我们真的需要美国吗？其实不需要：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同时进行合作。例如，针对企业的国际税收已经在37个国家实施，而且效果不错。甚至可以进一步提高税率来进行一些跨境调整，就像我们所熟知并喜爱的那样；我们正在这样做以弥补碳税的影响。

我认为认为我们想要筹集资金但应该留在资金产生的国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的原因是，这些最大的跨国公司或亿万富翁所获得的收入是基于整个世界的：消费者遍布全球，生产者遍布全球，亿万富翁本身也非常流动性强。他们不仅分布在富裕国家：一些人位于印度，一些人位于巴西。世界就是他们的花园。因此，我不认为如果能够筹集到这笔资金，它就属于那个亿万富翁出生的国家。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此有何看法？Adrien Fabre 和合著者⁶。我们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些大规模的意见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将百万富翁的全球税用于低收入国家是否合适”。这与我的提议非常接近：它关注的是百万富翁而不是亿万富翁，并且不涉及公司。然而，有69%的美国民众支持这一提案，而美国人通常对征税持反对态度，因此他们对此税的支持表明了其实际可行性。欧洲人中有84%支持这一税收提案，因此这一税种实际上相当受欢迎。通过明确指定税收的具体用途，比如如果对亿万富翁征收此税，并提高公司的最低税率，这些税收将专门用于上述目的，这可能有助于增加公民的支持度——尽管不一定能说服财政部长，因为他们的预算需要平衡。

6 Fabre, Adrien, Thomas Douenne 和 Linus Mattauch (2023), 国际对全球政策的态度, 工作文件

我最后想讨论的是：假设你能筹集到这笔资金，你会如何使用它？我围绕这个问题所设定的价值观框架是，这笔资金是为了补偿未来因气候变化而失去的生命。当然，一旦人们已经死亡，他们就不需要这笔钱了，因此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用这笔钱来防止这些人原本可能不会死去。讨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除了第一点紧张的谈判焦点——即资金将从哪里来（即富裕国家是否会被迫为损失和损害基金出资？）之外，另一个焦点是：这笔资金将如何管理？富裕国家希望由世界银行来管理，而贫穷国家则希望由联合国管理，或者自己管理，实行一国一票制。迄今为止，贫穷国家在这两方面都未能获胜；资金仍然由世界银行管理。

但我们需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正确的处理方式。因为你会如何使用这笔资金？为什么需要筹集并花费这笔钱？它应该用于贫困人口：暂时忽略国家单位，让我们考虑贫困人口，因为他们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同时也是最无力应对的人群。很大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资助社会保护措施，特别是针对与气候相关的冲击的社会保护措施。今天，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账户或钱包连接到银行账户。这在全球范围内是可行且易于实施的，只需一些投资，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部分地区实现了这一点，使得你可以非常轻松地向他们发送资金，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大量的研究表明，人们会很好地利用这笔资金。基于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制定规则，在天气变热、干旱、洪水或其他已识别事件发生时，无需任何质疑，资金将自动发送给受影响地区的所有人。一些不太贫困的人也会收到这笔资金，但与整体贫困水平相比，这已经是接受的。这将是直接向个人的自动转账。然而，个人在其自身层面无法完成的事情，也应该对社区进行自动转账。这可以是村庄、一组村庄或城市。对于较贫穷的国家，符合条件的人，面对重大冲击时没有其他途径获得贷款的人，应该获得直接的自动转账以纳入预算，因为他们最终成为其社区的最后一道保险。这只能适用于最贫穷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从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对我来说，这一点超越了其他一切考虑，但这可能还不够。其次，如果没有真正的伙伴关系，贫穷国家将停止与世界其他地区合作，这不仅限于气候变化问题，还涉及其他所有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乌克兰问题上，非洲国家的热情参与并不如预期那般强烈。随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逐渐崛起并开始发声，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现实政治要尊重这种声音，无论你自己的看法如何。合作至关重要，因为在未来，如果经合组织国家成功地抑制了自身的排放，如果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排放继续快速增长，这种努力将会被抵消。最后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在没有适应措施、没有资金帮助各国和人民适应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减缓气候变化将变得不可能。如果没有适应资金，各国可能会试图通过捷径迅速致富。这些捷径在创造气候变化方面可能是极其昂贵的；一旦砍伐了森林，就无法复原。为了应对更高的温度，我们的能源需求将极大增加，而有能力负担的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大量消耗化石燃料以满足这一需求。例如，印度作为关键参与者，其官方立场是需要找到方法来资助所有这些能源需求。简而言之，如果国家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它们将转向使用化石燃料，如印度，在COP26上，印度因煤炭问题受到了批评。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我们陷入更僵化的政治立场之前，在更多人因此丧生之前，仍然有可能采取行动，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3 重新分配的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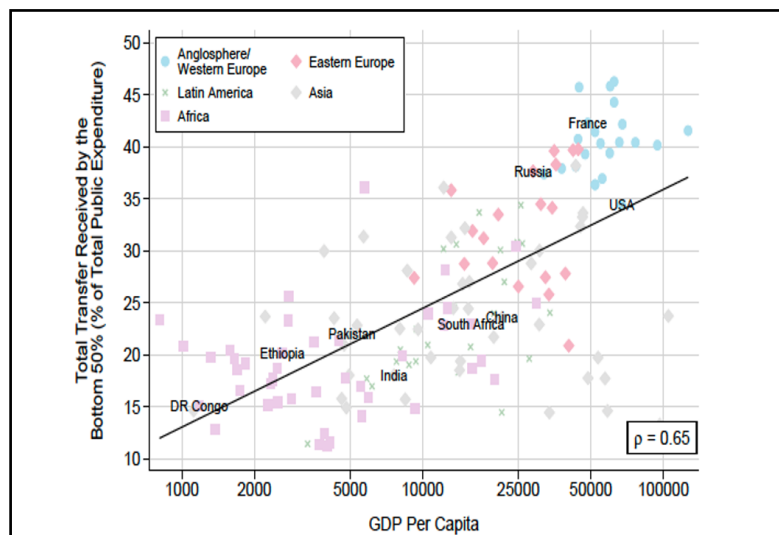
Abhijit Banerjee

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CEPR

Banerjee 着重讨论了在发展中国家中实现再分配和经济增长的问题，挑战了传统观点认为再分配会导致懒惰。他强调有效和公平的再分配对于应对经济困境、缓解贸易冲击以及促进生产力的重要性。Banerjee 还强调了跨境再分配和投资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贫困的必要性。他指出，要实现减贫目标，必须解决宏观经济和结构性约束，以及改变人们的信念和规范。

贫困国家在再分配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要低得多——我将展示一些数字——正如瑞玛·哈纳在之前的演讲中所示，有多种衡量方式。¹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情况不仅体现在GDP的比例上，也在公共支出的比例上，如Matthew Fisher-Post和Amory Gethin (2023, 图A14) 所示。² - 见图1。从GDP来看，这可能归因于财政能力的减弱，但更重要的是，公共支出中占比的减少更为显著。这强调了这不是关于资金的问题，而是资金分配的问题。还有其他指标可以表达相同的观点。图2展示了社会保障的程度，各国按此排序：最右侧的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乍得、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和尼日利亚，这些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你可以看到最贫困的国家在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保险上花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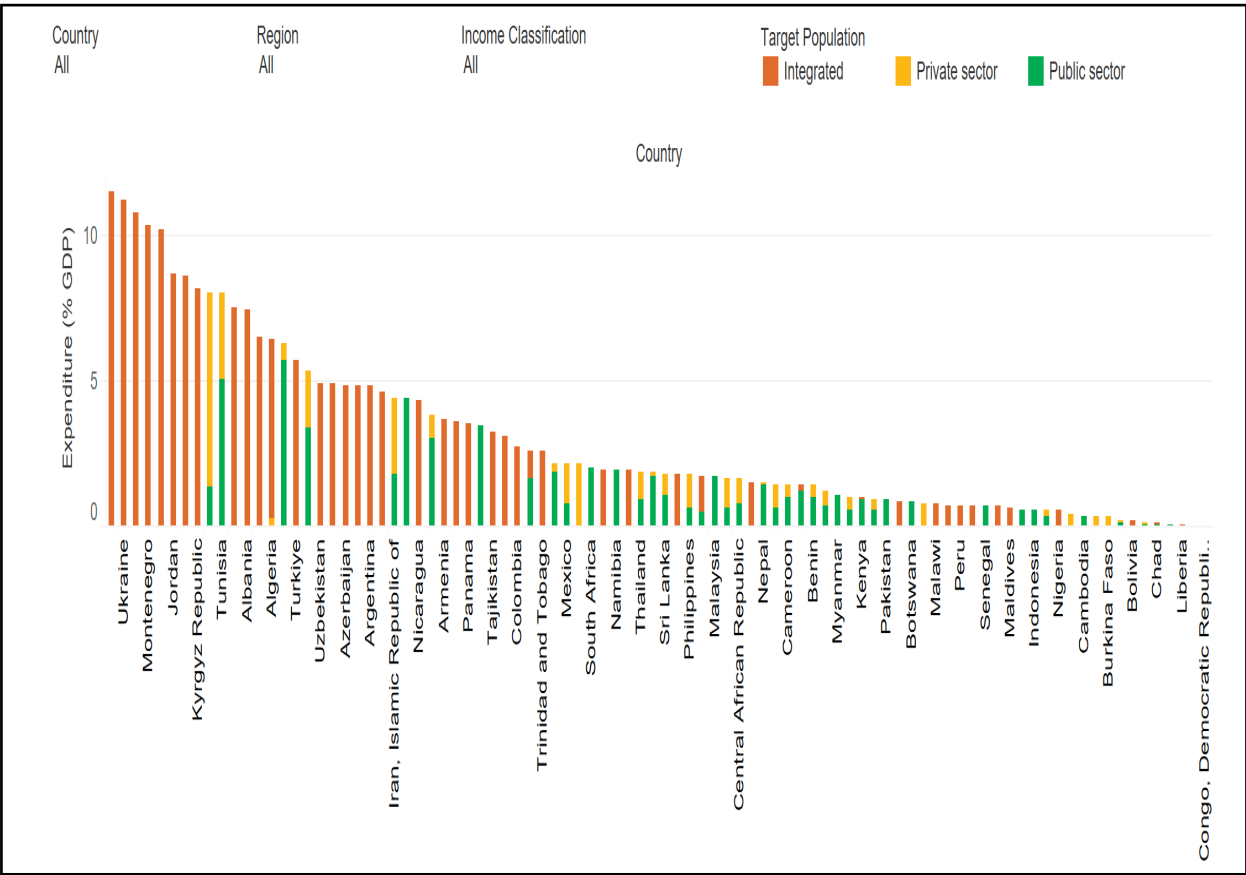
图1 发展过程中转移进步性：底层50%群体获得的总转移支付占总公共支出的百分比



Note 总转移接收额：表示在扣除税收前接收到的所有转移支付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

1 Abhijit Banerjee, Rema Hanna, Benjamin A. Olken 和 Diana Sverdlin Lisker(2024), 发展中世界的社会保障, NBER 工作文件。2 马修·费希尔-波斯特·阿莫里·格辛 (2023), 政府再分配和发展税收和转移累进性的全球估计, 1980 - 2019, 工作文件

图 2 贫穷国家的社会保险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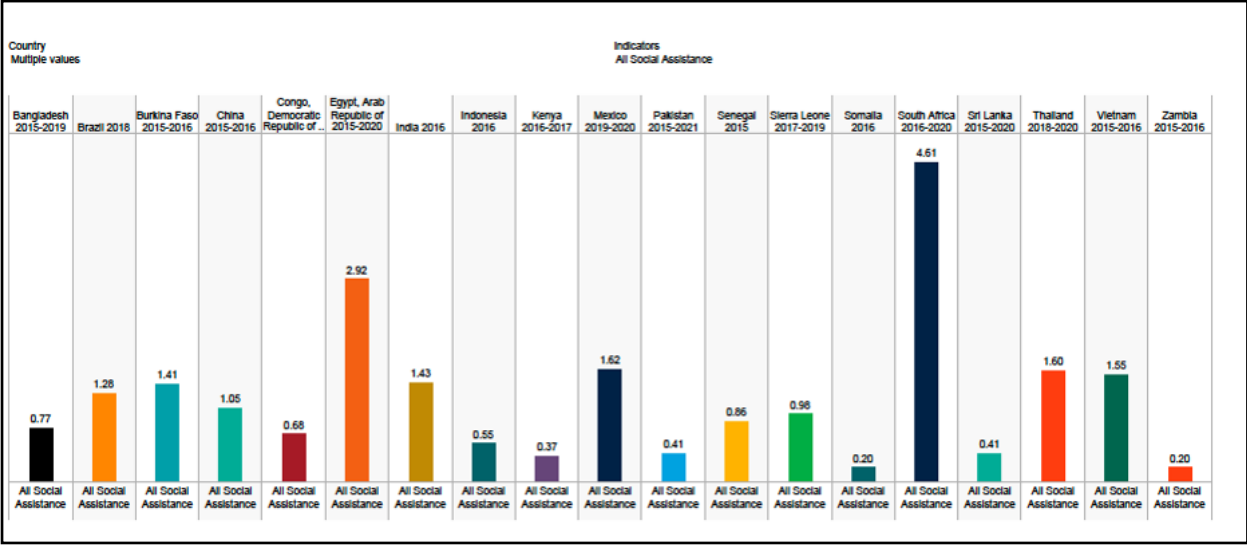
Note: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是强制性的、专门针对公共部门人员的扩展覆盖计划。
员工（例如：非制服的政府部门员工、武装部队成员、警察、司法人员、国有企业的工人）
企业等。私营部门养老金计划仅将覆盖范围扩展至私营部门员工。整合
养老金计划覆盖同一计划下的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员工。社会保险（SI）支出
指的是除标记有*的项目仅包括福利支出外，其他支出包括福利和行政成本。
无法获得总支出。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 数据库。

一种新的视角是采用更狭窄的标准。如图3所示，具体表现为社会援助措施，特别是转移支付项目，最贫困群体所获得的支持也是最小的。

确实富裕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因此并非所有差异都源于贫穷。图4显示，如果考虑社会保护措施，美国在这方面远不如芬兰或丹麦等国家，差异程度非常大，这意味着存在其他导致差异的原因，我将在后面再详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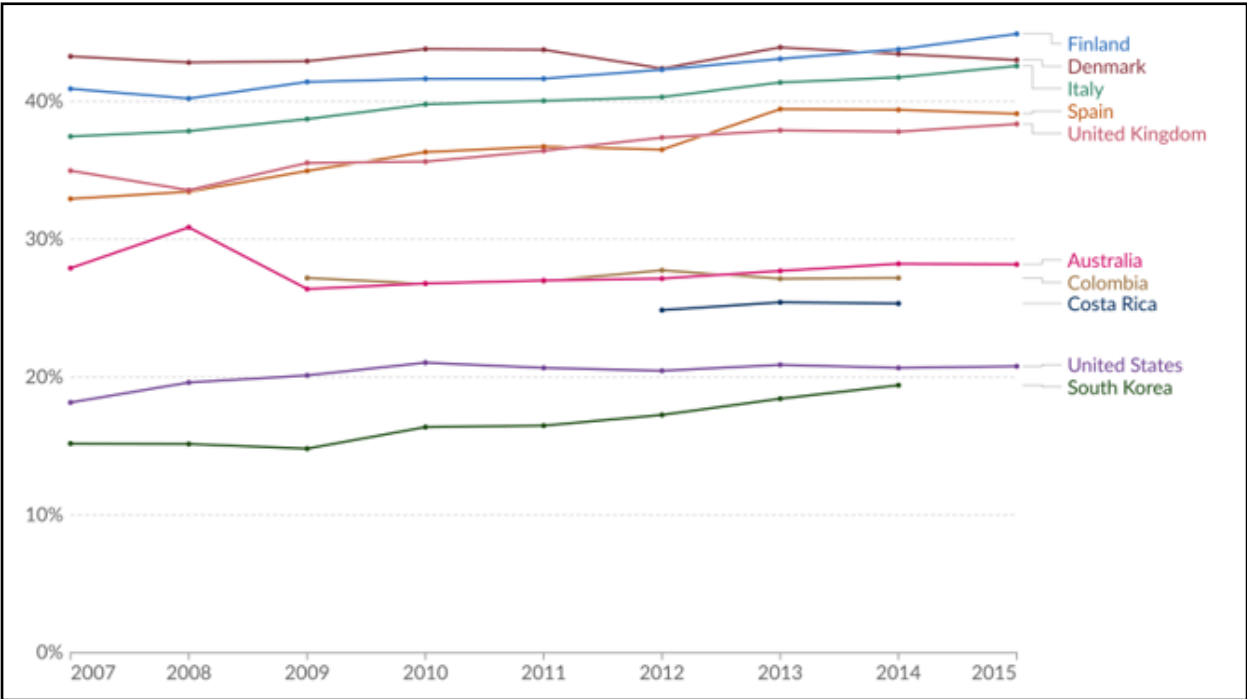
首先，贫穷国家在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保护的较低这一事实引发了疑问：这样做是否合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存在财政约束。有些开支是不可避免的；你可能总是需要在国防或警察上进行支出，这些是固定成本。从最传统的社会转移理论出发，这种转移主要是为了收入分配的原因而非生产效率的原因，观察收入分配情况，贫穷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平等。具体而言，尽管视窗期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贫穷国家实际上更加不平等。因此，如果目标是减少不平等，贫穷国家对再分配的需求应该更高。如果将减少极端贫困视为再分配的第一目标，显然，全世界所有极端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贫穷国家。因此，从表面上看，无法仅以资金不足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再分配较少。

图 3 各低收入国家的社会援助差异很大，最贫穷国家的社会援助最低。



注：社会援助（SA）支出指的是福利支出和行政成本。年度社会援助（SA）支出通过汇总2015-2021年间最近可获得年的项目级社会援助数据来计算，并标准化为标准的社会援助支出。总社会援助支出除以国家GDP（当前价值），以计算该指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ASPIRE数据涵盖了近80%的世界银行客户国家，但不包括高收入国家。

图 4 2007 年至 2015 年社会保护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 (数据中的我们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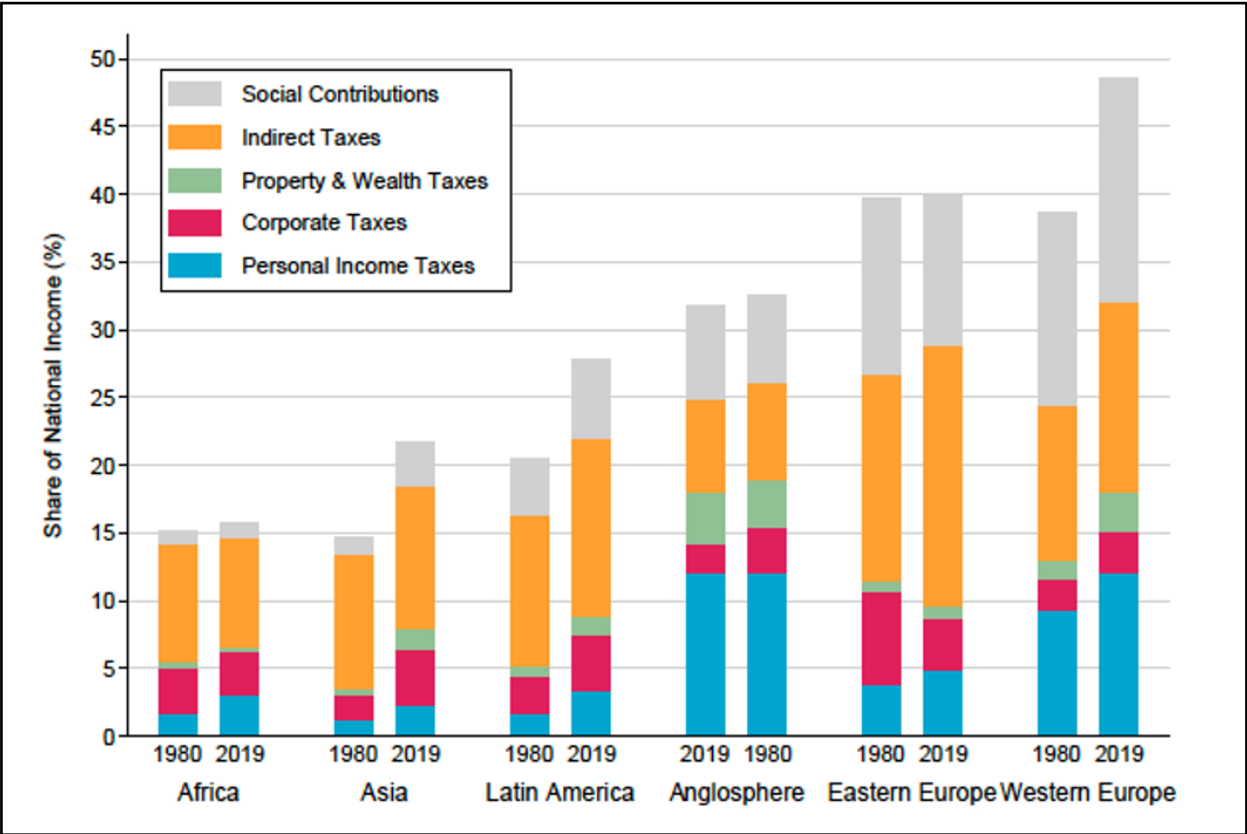
来源：政府概览经合组织 (2017)

Note 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社会保障包括以下主要领域：疾病、残疾、养老金、住房、失业、家庭和儿童。

另一方面，财政约束非常现实，如图5（来自Fisher-Post和Gethin, 2023, 图表2）所示。在此，如果我们查看非洲地区，他们将GDP中用于税收的比例接近15%，而法国则接近52%。这些差异相当大。此外，大部分这种

收入来自于间接税，这使得它们难以发挥重新分配的功能，因为在许多国家，间接税往往是累退性的。即使不是累退性的，间接税也最多只是接近线性。因此，如果试图通过间接税来扩大社会保障，立即会遇到一个约束：你从A那里拿钱再给回A。在西欧，间接税占总支出的比例要小得多。你可以开始看到这种不愉快的权衡：在不严重伤害穷人的情况下，很难从人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此外，还有一种常常被使用的其他累退性税收工具——通货膨胀。

图 5 1980 - 2019 年世界地区税收收入



来源：Bachas 等人的数据(2022)

Notes：各国税收收入总量的人口加权平均数。

所述并非意味着穷国应当更广泛地进行再分配且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无法做到。事实上，在我受教育的那个时代，提出这种观点被视为异端邪说。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认为，对于穷国而言，增长与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简单的权衡关系，而增长显然是更为优先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气候变化问题，富国是否需要继续增长并不明显；实际上，也许最好它们不增长——这同样是异端邪说，但我要这么说。因此，当时普遍认为穷国需要增长，而再分配对增长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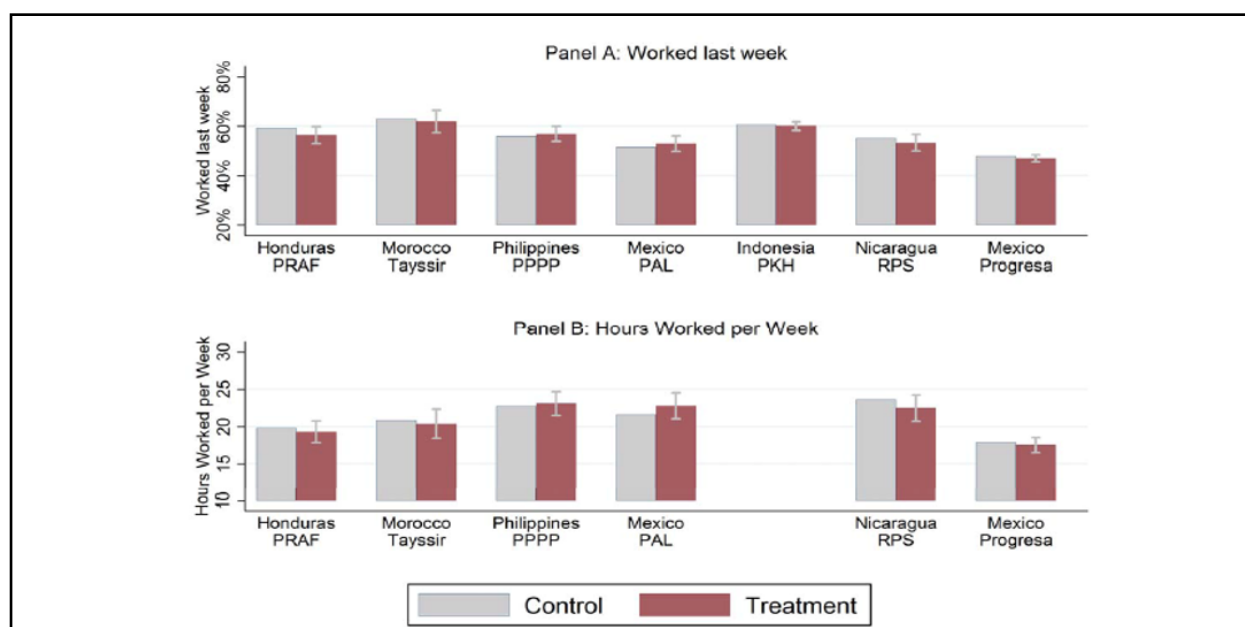
有一条并行的叙述涵盖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即认为无需对此担忧，因为增长本身会导致平等，并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有段时间数据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福布斯于2000年发表的一篇25年旧论文（Forbes, 2000）提到了这一点。³ - 而在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 研究发现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与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呈正相关。换句话说，减少不平等的努力在五年后被经济增长率下降所跟随。埃丝特和我唯一一次涉足跨国数据研究，

3 福布斯，克里斯汀·J (2000)，对不平等与增长关系的再评价“美国经济评论”，90 (4)，第 868 - 887 页。

我们在其中确实发现不平等减少与增长下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样地，不平等增加也与增长下降正相关；所有不平等的变化似乎都与增长下降相关，这表明这些关系可能是虚假的，并且很可能当国家处于困境时，其数据测量会变得更差。总体而言，这不是我最偏爱的研究论文之一，但它确实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即阻止人们撰写此类论文。更为稳健的相关性是，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Daron Acemoglu 近期在这方面进行了更多研究，还有许多其他人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讨。改变不平等性的因果效应则更为复杂。

作为微观经济学家，我关注数据所能揭示的关于潜在因果机制的信息。人们为什么认为再分配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因果机制是什么，我们能否对此进行分析？第一个最传统的问题源于这样的观念：有时，在进行再分配时，人们可能会变得懒惰。然而，正如Dean Karlan所提到的，关于收入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图6来自我们与Rema Hanna、Gabriel Kreindler和Benjamin Olken合作的旧论文。⁴ 显示了现金转移支付的效果。灰色条表示对照组，紫色表示处理组，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差异。这是一个已确立的事实，即当向贫困人群提供金钱时，劳动供给会上升而不是下降。

图 6 来自多个 RCT 的证据



这是一步不错的进展，表明至少我们不需要担心向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接下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在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停止提供福利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由于是定向提供的，停止提供福利是否会产生一种抑制效应？这实际上变成了对人们收入的一种税收，因为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得到的福利也越来越少。这是否是一个大问题？公共财政学界的共识是，人们似乎不太擅长在边际上进行操纵，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福利系统的不透明性，这是好事：很难找到具体的边际。因此，这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从非常高透明度激励措施的高弹性估计来看，弹性为0.15。这与认为转移支付应普遍提供所需的标准相去甚远。最糟糕的情况是这种影响仅限于一个小范围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弹性也较小，因此很难对此过分担忧。此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采取：可以将补贴与工作挂钩，这样仍然可以在顶部实现逐步取消，但在底部则会增加参与的动力，从而促使那些接近工作边缘的人更多地参与工作以获得收入。因此，总体而言，它确实会

⁴ Banejee, Abhijit V., Rema Hanna, Gabriel E. Kreindler 和 Benjamin A. Olken(2017), [揭穿懒惰的福利接受者的刻板印象：来自现金转移计划的证据](#) “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员”，第 32 卷，第 2 期 (2017 年 8 月)，第 155 - 184 页

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正如Gabriel Zucman在论坛第一天所解释的，对于富裕人群而言，几乎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税收会对努力产生抑制效应。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富裕人群试图逃税，这一点必须予以考虑。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税制，但这并不主要在于劳动供给的抑制效应。关于这会减少经济增长的说法在我看来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给定这些情况，我们对人们的行为了解到了什么？考虑反向问题：如果给予人们金钱，他们会变得更加勤奋而不是变得懒惰吗？我们已经稍微看到了关于这个观点的一点点内容，即他们可能工作更努力。有几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Paul Niehaus 今天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其中的一个观点：不规则性似乎很重要；人们似乎会像对待不规则投资一样行事；他们希望资金以大额形式存在；如果你给他们每月的钱，他们会试图将其转化为更大的金额。有证据表明，人们认为他们的消费或投资是不规则的。这仅在他们受到信贷限制的情况下才重要；如果你可以借款，你现在就可以使用这笔钱，以后再偿还。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信贷限制；即使在非常高的利率下，人们仍然受限于他们能借多少钱，因此这可能是合理的解释之一。这也必须意味着你不能在家储蓄：如果你可以在家储蓄，那么你只需通过积累来做到这一点。因此，这两个因素很可能是现实的约束条件，如果不进行投资，你的生产率将保持较低水平。支持重新分配的理由很简单：它可以使必要的投资更容易实现。还有一种不同的但合理的理论是风险是一个主要的阻碍因素。再次，这是一个旧的想法：你贫穷，离饥饿边缘很近。我认为正是因为你贫穷——这是我当前特别关注的问题——人们往往会非常担心某种形式的遗憾。他们担心，如果将家庭辛苦赚来的钱投资到某项东西中并失去它，那将是可怕的。我认为风险规避和遗憾在这一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重新分配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后盾来鼓励冒险行为，甚至可以采取保险的形式，为你覆盖不良结果。

有近期的研究表明，贫困具有压力性，人们花费大量时间担心如何维持生计，因此难以专注于长期规划。再分配的作用在于为人们提供心理空间，让他们不必担心如何支付学校费用。戴恩·卡兰⁵做了出色的工作来解释转移项目的发展 Landscape 并说明它们的作用，很明显的是，转移项目能够持久地提高收入：即使在转移停止几年后，仍然可以看到效果。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一些我们与Dean Karlan和Esther Duflo共同完成的工作是关于向极度贫困人群转移资产。这值得关注，因为它为这些转移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具体的视角。这个项目是我们多年前在一个由Dean组织的团队中评估的一个计划，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国家。该项目涉及参与者选择的一些资产，通常是某种类型的牲畜，一些培训和一些鼓励，以及一些临时的现金援助。这个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参与者被选为贫困地区中最贫困的人群。选择机制有时实施得更好，有时则不然，即这些人不仅贫困，而且来自那些社区的人们被要求提名该社区中最贫困的人。在Esther和我研究的样本中，这些人主要靠乞讨为生：他们几乎没有职业。他们通常都是女性，并且通常有孩子，他们的丈夫或伴侣要么离开了她们，要么变成了酒鬼，或者已经去世，她们年轻时就结婚了，有时甚至是在13岁时，所以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技能。这个群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拥有极少的人力资本；他们需要扶持；他们需要安慰。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说：这些人从未尝试过任何事情并失败了。他们实际上是非常新的个体，如果你认为使他们如此的原因仅仅是运气不好，那么你可能会想象他们并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被排除在外；他们只是因为坏运气而贫穷。因此，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样本，可以用来证明即使看起来完全无法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人也可能给你带来惊喜。我们在各国的发现是，在资产分配后三年，以及所有临时的现金援助之后，这些人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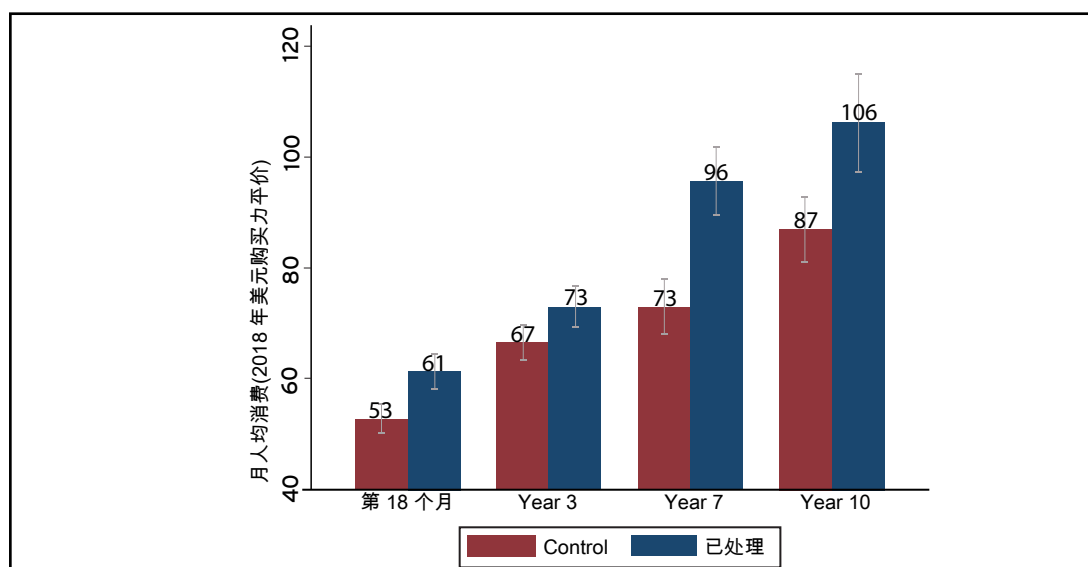
5 https://bpb-us-e1.wpmucdn.com/sites.northwestern.edu/dist/6/2076/files/2024/05/UCT_Meta_Analysis_Oct4-2023.pdf

他们在前六个月内收到的收入已经停止增长，但他们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性资产，工作时间更长，earnings更高，并且更加幸福和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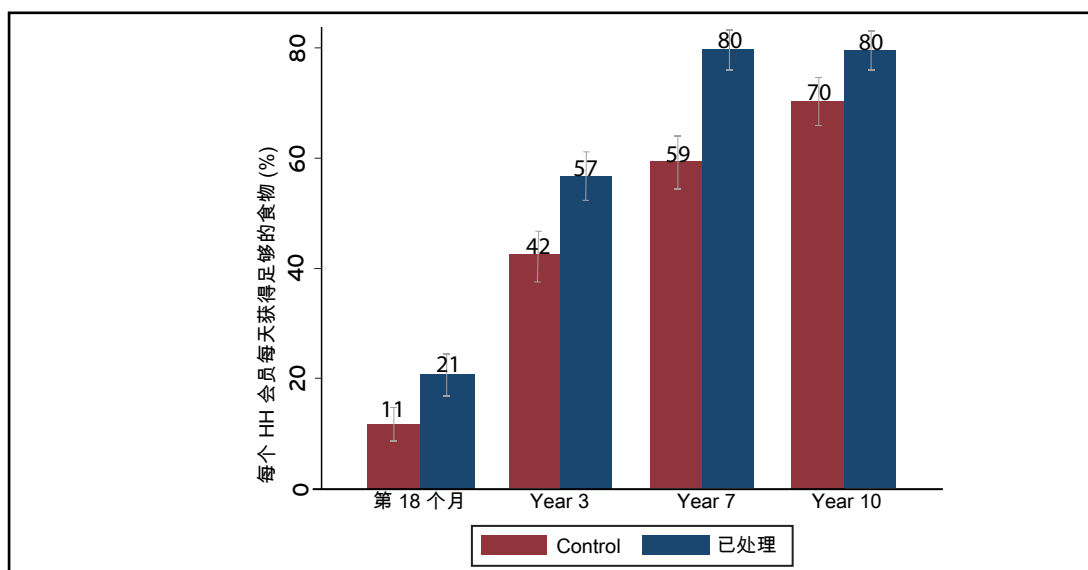
在印度项目中，我们跟踪了他们10年。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回去查看他们在治疗后的第15年或第17年的状况。图7展示了治疗组和对照组：红色表示对照组，蓝色表示治疗组，观察从治疗后18个月到治疗后10年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差距始终为正且相当大，在诸如消费、粮食安全和收入等方面存在20%至25%的差距：他们的表现更好。

图 7 印度方案的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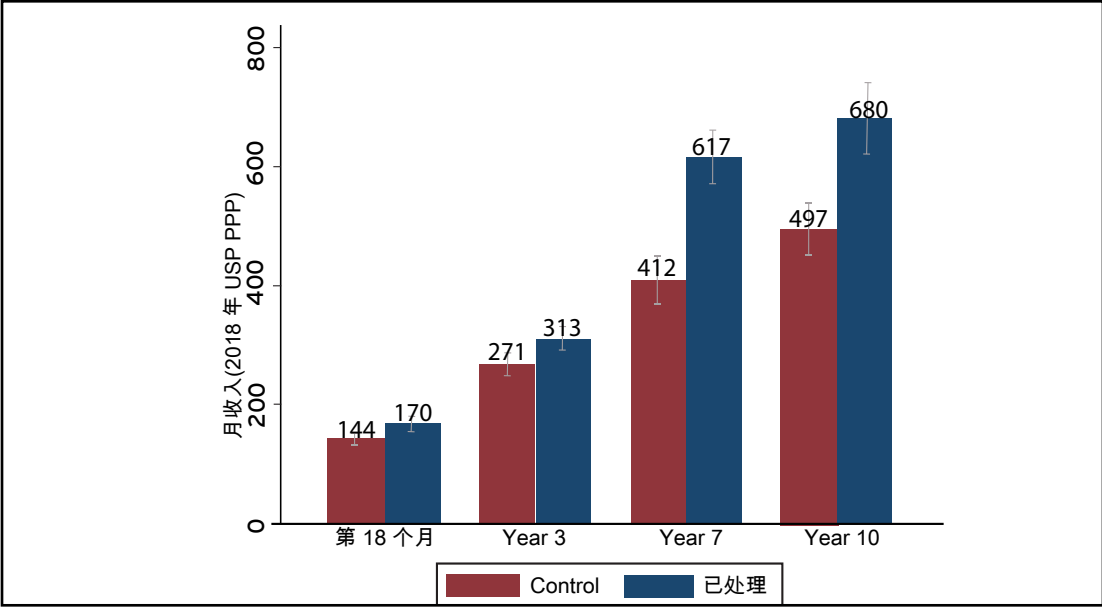
小组 a：人均消费量(2018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b 小组：粮食安全



小组 c：每月家庭收入(2018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



这是一个持久的变化。我不知道它能否永远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有趣的问题是：如果我给予他们一次提升，他们是否能因此走得更远？这提高了回报率。我想强调的是他们在利用这些资产的方式：尽管我之前提到了他们的背景情况，但他们却是充满活力的企业家。在最初的18个月里，额外收入来自于畜牧产业。在第三年至第七年之间，额外收入开始来自其他领域：不是来自畜牧，而是来自非农业的另一项业务。当他们有机会时，他们会进行转换。他们变得稍微富裕了一些，可以用钱做些其他事情，于是他们确实用钱做了其他事情。最终，在他们处于7到10年的阶段时，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开始用钱将孩子们送到更远的地方，这时的主要收入增长来自于移民：孩子们有了不同的移民模式。这个故事所代表的核心思想是这些人能够抓住机会，具有想象力，并且能够在即使从最差的起点开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各种机会。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当你回到这个问题是否有效的问题时，当然，这还涉及到对谁来说是有有效的问题，但这些人仍然是未纳税的人。如果仅从财政回报的角度考虑，如果你给他们钱，就不能再收回。另一方面，如果消费增加25%的情况持续下去，那么这相当于将资金回报率提高1100%。因此，如果目标是促进增长，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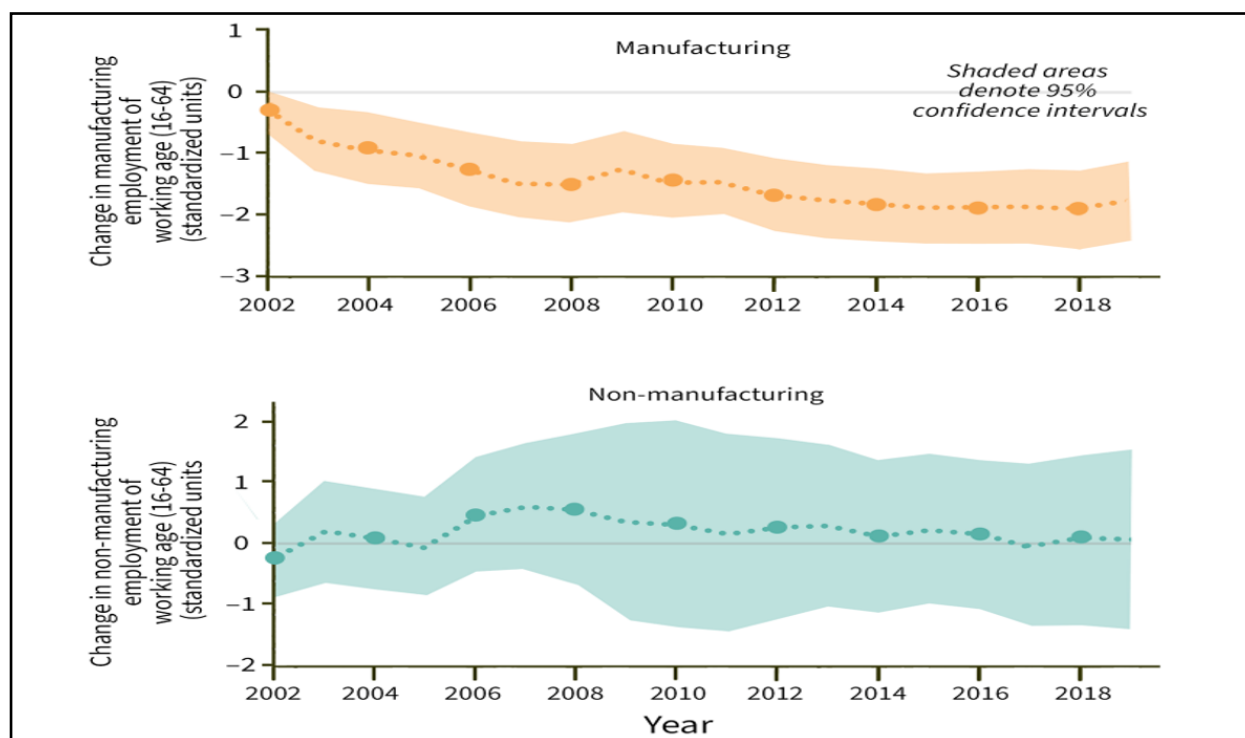
这种向贫困人口提供资金可以提高生产力的想法已经被广泛研究。这些包括转移项目计划，此外还有Dean Karlan和Christopher Udry的研究。⁶ 有一项研究显示，对农民提供的补贴保险对其收入有显著影响，且Gharant Bryan、Shyamal Chowdhury和Mushfiq Mobarak参与了这项研究。⁷ 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为人们提供迁移贷款，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保证在发生某些灾难时无需偿还该贷款，这就足够了。因此，即使仅仅是补贴保险（有时成本较高，但往往不高）也足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保险已经产生效果的事实表明，风险规避或损失规避是重要因素之一。信贷约束也是重要的。

6 Dean Karlan, Robert Osei, Isaac Osei-Akoto, Christopher Udry(2014), 放松信贷和风险约束后的农业决策, 《经济学季刊》, 第 129 卷, 第 2 期, 第 597 - 652 页 7 Gharant Bryan, Shyamal Chowdhury 和 Ahmed Mushfiq Mobarak (2014), 对有利可图的技术的投资不足: 孟加拉国的季节性迁移案例 “计量经济学”, 第 82 卷 (5), 第 1671 - 1748 页。

鉴于此，正如保罗今天所展示的，资金的波动性以及进行适当规模投资的能力。我们有独立的证据，包括我们与克里斯·乌德里在加纳合作的一些工作中得到的证据，显示那些在该计划中获得牲畜的人在其他形式的工作上变得更加高效：我们让他们生产袋子，当他们忙于其他资产时，他们生产袋子的效果更好。因此，使人们忙碌并不会降低他们的生产力。相反，这会让他们更加高效。这与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和压抑的观点是一致的，当他们感到不再那么消极时，可以做得更多。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太少而不是太多。

有第三个理由重新分配财富，这与你昨天听到的内容有关，但我希望强调其普遍性。另一个经典的重新分配理由是我们经常受到他人做出的选择的影响，贸易冲击是最典型的例子。例如，金融危机虽然我们暂时忘记了，但很快就会被重新提及；当然还有气候变迁。图8展示了“中国冲击”的案例，来自Autor、Dorn和Hanson的研究。这张图表显示，一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自由出口商品，美国生产中国擅长出口到全球的商品的行业遭受了重创。这种影响解释了大约60%的美国制造业下滑，因此这不是一个小效应。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非制造业领域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这种影响非常集中。地理上，某些地区几乎完全被摧毁，而大多数美国地区则受益于更便宜进口商品的涌入，消费变得更加容易：大多数人从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贸易中获益，但少数人受到了打击。这就是贸易冲击的本质。经济学界为此制定了一个计划，称为重新分配：美国有一个名为贸易调整补助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那些因贸易而遭受负面冲击的地区。每增加1000美元的人均进口额，工人收入下降549美元。贸易调整补助支付了3.45美元给他们。换句话说，回到我的原始主题，在富裕国家，他们并没有像需要的那样进行大量的重新分配。这也是为什么重新分配面临的政治挑战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我想最后总结的内容。

图 8: 补偿失败者是行人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各国不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如我所述，这些问题并不一定仅限于贫穷国家：美国的收入再分配非常有限，除非将教育和主要的医疗保健视为一种再分配形式。在美国的情况下，再分配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医疗保健的看法：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极其高昂。因此，贫困人群能够获得这些医疗服务对整体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分配的程度如何。但问题是教育和医疗的价格是否反映了社会成本。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它们反映了社会成本，那么美国实际上通过医疗保健进行了大量的再分配。如果你认为它们没有反映社会成本，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再分配发生。

当然，原因之一是各国不进行更多再分配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投票是多维度的：你在很多方面进行投票，有时一些人只是为了限制女性堕胎权而投票，并且他们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关心。这种组合往往会削弱再分配。另一个原因是选民——而不是经济学家——相信税收是再分配的。表1中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一列是经济学家，第二列是普通美国人；这是一个代表性样本。你可以看到认为拉弗曲线有效的人——减税会导致税收收入增加，因为一旦减税，人们就会更加努力工作。没有经济学家相信这一观点。请记住，这是由芝加哥大学组织的一组领先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特别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名单。如你所见，90%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但世界相信这一点。这非常有趣：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过有效地种植这个故事为我们做了贡献。罗纳德里根是他的朋友，他们共同宣传了这一观点，以至于人们，尤其是穷人，非常不喜欢税收。

表 1 美国现在降低联邦所得税率会提高应税收入，使得在未来五年内的年度总税收收入高于不进行减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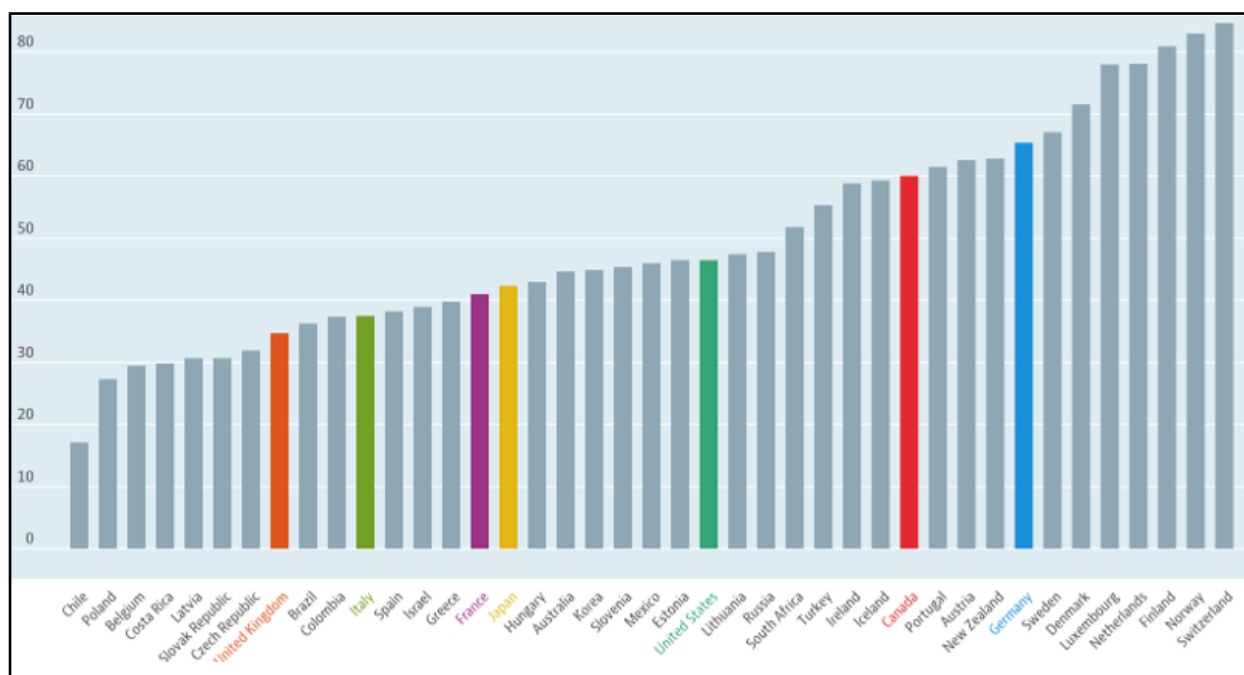
	% 经济学家	% 已调查	% 经济学家 - % 已调查
强烈同意	0	7.7	-7.7
同意	0	25.4	-25.4
不确定	10.1	42.9	-32.8
不同意	41.8	15.4	26.4
强烈不同意	48.1	8.6	39.5

埃斯特班·杜弗洛和我与斯泰芬妮·斯坦彻瓦合作，我们询问人们：如果让我们以某种形式更容易不工作，你会怎么做？我们也问：如果让其他人更容易不工作，他们又会怎么做？人们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不会改变，我会继续工作，但其他人将会停止工作。因此，这使得人们接受这一信息的方式更加有趣。

没有进行再分配的第三个原因是政府信任度低。许多国家的政府信任度较低，如图9所示。虽然有一些国家的情况不同，但如果你选择你最喜爱的国家，可以看到：对于英国，回答“信任政府”的比例是30%；美国略高一些，但美国人非常民族主义；法国介于美国和英国之间。可以看出，在我们关注的许多国家中，这一比例都低于50%。

当然，这非常重要，因为重新分配始终会是一项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发生不幸事件时，这种政策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大多数人在考虑保险类型计划时，都会担心这些计划在真正需要时能否兑现承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则很难实施这些计划。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以气候变化冲击为例：如果人们不相信政府，就很难想象能够获得公众的支持，因为人们会认为政府在撒谎，并且只会将其利益给予特定的朋友。这种对话中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你会给予你选择的少数群体”。

图 9 问题：在贵国，您对.....国家级政府是否有信心？（样本事先设计为全国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的代表性样本。）



回到我之前提到的再分配问题：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最终觉得政府欺骗了他们有关。当面临贸易冲击时，他们没有得到承诺的好处：钱没有到位。政府告诉他们贸易对所有人都好，NAFTA对所有人都好，WTO对所有人都好。但他们知道有些人——也许不是自己，但确实知道一些人——因为这个政策而受损，而政府却没有采取行动。这也是你们年长者所面临的相同挑战。黄背心运动抗议破税，他们的投诉正是这一点：我们会支付税款，然后你却用这笔钱去帮助富人。再加上财富税的削减甚至取消，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他们不信任政府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似乎无法以可信的方式运作。至少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在当前环境下面临的挑战更大，尤其是考虑到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必须思考跨国再分配的问题。关于再分配会减少经济增长、资金消失无踪、人们变得懒惰，以及资金只流向政府朋友等这些论调都是极其有害的。我们想要应对气候变化，并且需要能够做出长期且可信的补偿承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关于再分配有害或更糟的论述，事实上，从证据上看，另一面的观点是完全透明的。我知道经济学家应该两面兼顾，我们总是说“另一方面”，但这次我不想这么说，而是要明确地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再分配，并且需要做得更好，还要让人们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

